

红旗

1102604

23



一九六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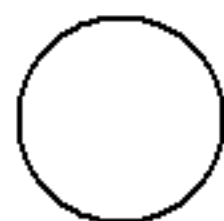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三年第二十三期 ★

目 录



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

——六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1)
列宁和斯大林的和平共处政策	(1)
中国共产党坚持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	(5)
苏共领导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	(8)
三个原则性的分歧	(9)
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适应美帝国主义的需要	(14)
苏美合作是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的灵魂	(17)
劝告苏共领导几句话	(20)

信用合作社在我国现阶段的历史使命 邓子恢 (21)

新老殖民主义者争夺刚果的真相 苑 文 (30)

现代资产阶级的新实在论哲学 任 华 (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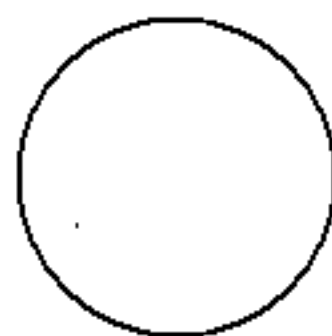
☆ 十二月十二日出版 ☆



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

六評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編輯部
紅旗杂志編輯部



自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和平共处問題，要算是赫魯曉夫等同志讲得最多的一个問題了。

苏共領導口口声声說，他們忠实于并且創造性地发展了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他們把世界各国人民經過长期革命斗争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都記在自己的“和平共处”的功劳簿上。

苏共領導大肆宣揚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贊成和平共处，大肆誣蔑中国共产党和一切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反对和平共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甚至胡說什么中国主張同帝国主义“进行发动战争的竞赛”。

苏共領導把自己背棄馬克思列宁主义、背棄无产階級世界革命、背棄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事业的許多言行，說成是符合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的。

但是，“和平共处”这几个字果真能够成为苏共領導背叛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种护身符嗎？不能，不能，絕對不能。

摆在我們面前的有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

一种是列宁和斯大林的和平共处政策，这也就是一切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包括中国共产党人主張的和平共处政策；

另一种是反列宁主义的和平共处政策，这也就是赫魯曉夫等人主張的所謂“和平共处”总路綫。

現在，我們来看一看，列宁和斯大林的和平共处政策是怎么样的政策，而赫魯曉夫等人的所謂“和平共处”总路綫又是怎么样的貨色。

列宁和斯大林的和平共处政策

社会主义国家对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实行和平共处政策的思想，是列宁提出来的。这个正确的政策，是列宁和斯大林領導下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长期实行的政策。



在十月革命以前，世界上根本没有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也就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問題。但是，早在一九一五年和一九一六年，根据对帝国主义所作的科学分析，列宁就預見到：“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某些时期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资产阶级以前时期的国家”^①。这也就是说，在一个时期之内，世界上将出现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前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并存的情况。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决定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实行和平的外交政策。列宁說过，“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在夺取政权以后，在实际上而不是口头上执行和平政策”^②。可以说，列宁的这种观点，是和平共处政策的思想基础。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多次向全世界宣布苏维埃国家的和平外交政策。但是，帝国主义者却一心想把新生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扼杀在摇篮里。他们对苏维埃国家发动了武装干涉。面对着这种情况，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不武装保卫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就不能存在”^③。

直到一九二〇年，伟大的苏维埃人民战胜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在苏维埃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形成了一定的相对的均势。经过了几年的实际较量，苏维埃国家站住了脚。苏维埃国家开始由战争转入了和平建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提出了和平共处政策的思想。事实上，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帝国主义才被迫接受同苏维埃国家“共处”。

列宁在世的时候，这种均势一直是极不稳定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处在严重的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列宁多次指出，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这种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和平相处的局面，能不能长久保持下去，是无法担保的。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列宁还不可能规定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政策的详细内容。但是，伟大的列宁已经为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定了正确的对外政策，也提出了和平共处政策的基本思想。

列宁关于和平共处政策的基本思想是什么呢？

第一，列宁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是根本违反帝国主义意愿的。尽管社会主义国家坚持实行和平的外交政策，但是，帝国主义总是不愿意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总是要利用一切可能，抓住一切机会，来反对以至消灭社会主义国家。

列宁說：“无论按国际帝国主义的客观地位来说或按它所体现的那个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来说，它都不能和苏维埃共和国和睦相处”^④。

① 《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版，第75页。

② 《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决议案草案》。《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09页。

③ 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28页。

④ 列宁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版，第80页。



列宁还说过：“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是不可思议的。其结局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在这个结局还没有到来的时候，苏维埃共和国和资产阶级国家间的一系列最可怕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①

因此，列宁一再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对帝国主义要经常提高警惕。他说，“所有工人和农民都应当记取的教训，就是要时刻戒备，要记住我们是被那些公开表示极端仇恨我们的人、阶级和政府包围着的。必须记住，我们随时都有遭受任何入侵的危险。”^②

第二，列宁指出，苏维埃国家之所以能够同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是靠斗争得来的。这是苏维埃国家采取正确的政策，依靠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支持，利用帝国主义的矛盾，同帝国主义国家反复较量的结果。

列宁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说过：“这是常有的事情，你打痛了敌人，他就会来讲和的。我们曾不止一次地向欧洲帝国主义者老爷们说我们同意和平，但是，他们却幻想奴役俄国。现在他们懂得他们的幻想是一定不能实现了。”^③

列宁在一九二一年指出，“各帝国主义强国虽然切齿痛恨苏维埃俄国并且企图进攻苏维埃俄国，但它们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分崩离析愈来愈厉害了，团结愈来愈削弱了，而拥有十亿以上人口、受尽压迫的殖民地各国人民的反抗却一年比一年、一月比一月、甚至一星期比一星期更加剧烈。”^④

第三，列宁在实行和平共处政策的时候，对资本主义世界不同类型的国家，采取不同的方针。

列宁特别重视同受帝国主义欺侮和压迫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他指出，“一切遭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帝国主义的世界政策也就促成了一切被压迫民族的接近、联盟和友好”。他说，苏维埃国家的和平政策可以“使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同它周围愈来愈多的邻国的联系日益密切起来”^⑤。

列宁还说：“现在我们提出的主要任务是：战胜剥削者并把动摇者争取过来，这是世界性的任务。许多资产阶级国家就是动摇的；作为资产阶级国家，它们仇恨我们；作为被压迫国家，它们又宁愿同我们讲和平。”^⑥

① 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列宁全集》第29卷，第128—129页。

② 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关于共和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21页。

③ 《在全俄党的农村工作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23—124页。

④ 《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的闭幕词》。《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27页。

⑤ 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45—446页。

⑥ 《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工作》。《列宁全集》第30卷，第292页。



对于帝国主义国家，例如美国，列宁说：同美国保持和平的基础是，“让美国资本家不要触犯我们”。“我们这方面没有任何障碍。像其他任何国家的资本家一样，美国资本家方面的帝国主义才是障碍”^①。

第四，列宁提出的和平共处政策，是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在处理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关系方面的政策。他从来没有把和平共处政策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全部内容。列宁一再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最根本的原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列宁说：“苏维埃俄国认为，能够帮助全世界的工人进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艰苦斗争是最大的骄傲。”^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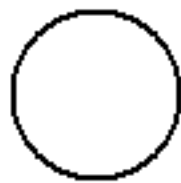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发布的和平法令中，在向一切交战国建议立即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的同时，号召资本主义国家的觉悟的工人“以多方面无比坚决果敢的行动，帮助我们和平事业以及使被剥削劳动群众摆脱一切奴役和一切剥削的事业有成效地进行到底”^③。

列宁为俄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党纲草案中，明确地规定，“支持先进国家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支持一切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主运动和革命运动”，是党的国际政策的重要内容^④。

第五，列宁一向认为，被压迫阶级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同压迫民族，是不能和平共处的。

列宁在《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中指出，“即使是最开明最民主的资产阶级，也已经不惜采取任何欺骗和犯罪的手段了，不惜屠杀千百万工人和农民来挽救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厄运了”。列宁的结论是：“凡是以为可以用和平方式使资本家服从大多数被剥削者意志，可以通过和平的、改良主义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都不仅是极端的市侩的愚蠢行为，而且是对工人的公然的欺骗，对资本主义的雇佣奴役制的粉饰和对真理的隐瞒。”^⑤

列宁多次指出帝国主义的所谓民族平等的虚伪性。他说：“国际联盟和协约国战后的全部政策到处加强了先进国无产阶级和殖民地附属国一切劳动群众的革命斗争，加速了所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民族能够和平共居和一律平等的市侩的民族幻想的破产，从而更清楚更尖锐地揭示了这个真理。”^⑥



① 《答美国〈纽约晚报〉记者问》。《列宁全集》第30卷，第333—334页。

② 《给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和彼得格勒工人、红军代表苏维埃》。《列宁全集》第33卷，第375—376页。

③ 列宁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和平问题的报告》。《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29页。

④ 《列宁全集》第27卷，第144页。

⑤ 《列宁全集》第31卷，第163页。

⑥ 《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列宁全集》第31卷，第126页。



以上这些，就是列宁关于和平共处政策的基本思想。

斯大林坚持了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斯大林在担任苏联领导的三十年中，一直实行这种和平共处政策。只是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苏联发动侵略战争或者武装挑衅的时候，苏联才不得不进行卫国战争和自卫反击。

斯大林指出，“我国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的基础就在于两种对立的体系可以共处”。“同各资本主义国家保持和平的关系，是我们必须负担的任务”^①。

斯大林还指出，“只要双方有合作的愿望，决心履行所承担的义务，遵守平等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资本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的和平共处是完全可能的。”^②

在坚持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的同时，斯大林坚决反对为了讨好帝国主义而放弃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他曾经尖锐地指出，存在着两条对立的对外政策，“二者必居其一”：

一条是，“我们今后仍将执行革命政策，把各国无产者和被压迫者团结在苏联工人阶级的周围，——那时国际资本将千方百计地阻挠我们前进”；

另一条是，“我们放弃自己的革命政策，对国际资本做一系列原则性的让步，——那时国际资本大概不会反对‘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蜕化为‘善良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斯大林举例说，“美国要求我们从原则上放弃支持别国工人阶级解放运动的政策，说什么如果我们能做这种让步，那末一切都好办了。……我们也许可以做这种让步吧？”

斯大林接着回答说，不，“我们不能做诸如此类的让步，不能背叛自己”^③。

斯大林的这番话，直到现在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的确有两种根本对立的对外政策，的确有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善于识别这两种不同的政策，坚持列宁和斯大林的政策，坚决反对被斯大林痛斥的那种背叛的、投降的、不支持革命的政策，坚决反对那种把社会主义国家蜕化为“善良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策，是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重要任务。

中国共产党坚持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硬说中国共产党“不相信和平共处的可能性”，诬蔑中国共产党反对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

事情果真是这样的吗？不，当然不是这样。

任何尊重事实的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始终不渝地执行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在一系列国家中

① 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46页。

② 《答美国报界一些编辑提出的问题》。见1952年4月2日苏联《真理报》。

③ 《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7—48页。



取得了胜利，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民族解放运动空前发展，出现了一系列新获得政治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大大削弱，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化。这种形势，为社会主义国家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实行和平共处政策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执行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的过程中，丰富了它的内容。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前夜，毛泽东同志就说过：“我们向全世界声明：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則的基础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①

根据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这一方针，我们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的共同纲领中，以后，在一九五四年九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都明确地规定了和平外交政策。

中国政府在一九五四年倡议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就是：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在一九五五年的万隆会议上，我国同亚非各国一起，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共同制定了十项原则。

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国在国际事务方面的实践经验，进一步阐述了我国对外政策的总方针。他说：“为了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我们必须进一步地发展同社会主义阵营中各个兄弟国家的友好合作，并且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加强团结。我们必须争取同一切愿意和我们和平相处的国家，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我们都必须给以积极的支持。”^②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同志又说：

“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

“再就是亚非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我们应当巩固和发展同它们的团结。”

“至于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也要团结那里的人民，并且争取同那些国家和平共处，做些生意，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但是决不可以对他们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③

① 《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70页。

②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页。

③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8页。



十四年来，我們在国际事务中，对于不同类型的国家，对于同一类型国家的不同情况，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针。

第一，我們把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加以区别。对待社会主义国家，我們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互相援助的原则。我們把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作为我們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

第二，我們把新获得政治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加以区别。

民族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同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不同。但是，它們同帝国主义有着深刻的矛盾。它們在反对帝国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和维护世界和平等方面，同社会主义国家有着共同的利益。这就使得社会主义国家同民族主义国家建立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的关系，有着广泛的和现实的可能性。这种关系的建立，对于加强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团结、促进各国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

我們一贯坚持巩固和发展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的方针。同时，对于那些违反和破坏五项原则的国家，例如印度，我們进行了必要的和适当的斗争。

第三，我們把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加以区别。对于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我們也是区别对待的。

在国际阶级力量对比越来越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情况下，在帝国主义力量日益削弱及其相互间矛盾日益尖锐化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依靠本身力量的壮大，依靠各国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依靠同民族主义国家的团结，依靠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斗争，利用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有可能使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国家不得不同意建立某种程度的和平共处关系。

在坚持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同时，我們坚定不移地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义务。我們积极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积极支持西欧、北美和大洋洲各国的工人运动，积极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积极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

所有这些，都是集中于一个目标，这就是，以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无产阶级为核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统一战线。

十几年来，中国政府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經同許多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发展了经济、文化往来。中国先后同也門、緬甸、尼泊尔、阿富汗、几内亚、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和加納等国，签订了友好条约、和平友好条约或者友好互助和互不侵犯条约；并且还同緬甸、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圓滿地解决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持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所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就，是任何人都抹煞不了的。

苏共领导制造中国反对和平共处的謠言，是別有用心的。他們的目的，拆穿了說，就是要掩盖他們自己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勾結帝国主义的丑恶面目。



苏共领导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

真正违反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的，不是我们，而是苏共领导。

苏共领导把他们的和平共处说得天花乱坠。他们关于和平共处问题的主要观点是什么呢？

(一) 苏共领导认为，和平共处是解决当代社会问题的凌驾一切的最高原则。他们说，和平共处是“现时代的至高无上的绝对命令”，是“时代的无条件的要求”^①。他们还说，“和平共处是解决社会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的最好的和唯一可行的道路”^②，和平共处原则应当成为“整个当代社会生活的基本法则”^③。

(二) 苏共领导认为，帝国主义现在已经愿意接受和平共处，已经不是和平共处的障碍。他们说，“不少西方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现在主张和平与和平共处”^④，“越来越清楚地理解到和平共处的必要性”^⑤。他们特别宣扬，美国总统“承认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的理智性和现实性”^⑥。

(三) 苏共领导主张同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实行“全面的合作”。他们说，苏美两国“能够找到为了全人类幸福而协调一致地行动和努力的基础”^⑦，“能够为巩固和平和建立所有国家的真正国际合作而携手前进”^⑧。

(四) 苏共领导认为，和平共处是“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对外政策的总路线”^⑨。

(五) 苏共领导还认为，“和平共处原则正在决定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对外政策的总路线”^⑩，是当前“共产主义的战略基础”，全世界的共产党人都要“把争取和平共处的斗争作为自己政策的总原则”^⑪。

(六) 苏共领导把和平共处看作是各国人民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前提。他们认为，各国人民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是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条件下取得的”^⑫。他们说，“恰恰是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情况下，古巴实行了社会主义革命，阿尔及利亚人民获得了民族独立，四十多个国家取得了民族独立，各兄弟党成长壮大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

① 苏联《真理报》1962年11月18日波诺马廖夫：《世界共产党人的胜利旗帜》。

② 《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1962年第1期，鲁勉采夫：《我们的共同的思想武器》。

③④ 赫鲁晓夫1960年9月23日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

⑤ 赫鲁晓夫1960年2月21日在印度尼西亚日惹加渣玛达大学的讲话。

⑥ 赫鲁晓夫1960年1月14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

⑦ 苏联《消息报》1961年12月4日编辑部文章。

⑧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1961年12月30日给肯尼迪的贺电。

⑨ 赫鲁晓夫1961年7月5日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苏使馆的招待会上的讲话。

⑩ 《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1962年第12期，波诺马廖夫：《革命运动的若干问题》。

⑪ 苏联《共产党人》杂志1962年第2期，第89页。

⑫ 苏联《真理报》1961年2月8日波诺马廖夫：《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新阶段》。



影响增长了。”^①

(七) 苏共领导认为，和平共处是“帮助国际革命工人运动达到其基本的阶级目标的最好方法”^②。他们说，在和平共处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增长了。他们并且认为，社会主义在经济竞赛中的胜利，“将意味着对全部资本主义关系的毁灭性的打击”^③。“当苏联人民享受到共产主义的幸福的时候，世界上又会有几亿人說：‘我们赞成共产主义！’”^④那时，就是资本家也会“转而加入共产党”。

请看，苏共领导的这些观点同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究竟有什么共同之点呢？

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关系方面的政策，而赫鲁晓夫却把和平共处說成是当代社会生活的最高原则。

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是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的国际政策的一个方面，而赫鲁晓夫却把和平共处引伸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并且进而引伸为全世界所有共产党的总路线。

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而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则是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助长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

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是从国际阶级斗争观点出发的，而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则是在国际范围内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

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是从国际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出发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行和平共处政策的同时，应当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而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则是用和平主义来代替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背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赫鲁晓夫把和平共处政策变成了阶级投降政策。他利用和平共处的名义，背弃了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阉割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歪曲得不成样子，篡改得面目全非。

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明目张胆的背叛！

三个原则性的分歧

苏共领导同我们，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和平共处问题上的分歧，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要不要实行和平共处政策的分歧，而是究竟怎样正确对待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的原则分歧。这些分歧，主要集中在下面的三个问题上。

第一个问题：为了争取实现和平共处，要不要同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派进行斗争？实现和平共处，能不能消除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间的对立和斗争？

① 苏共中央 1963 年 3 月 30 日给中共中央的信。

② 1963 年 7 月 14 日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③ 《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 1962 年第 12 期，波诺马廖夫：《革命运动的若干问题》。

④ 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纲领》。



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向认为，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間实行和平共处，从社会主义国家方面說来，沒有任何困难。和平共处的障碍从来都是来自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派。

和平共处五項原則，是針對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提出的。根据和平共处五項原則，在国际关系中，不容許侵犯別国的領土和主权，不容許干涉別国的內政，不容許損害別国的利益和平等地位，不容許发动侵略战争。而侵略和奴役別的国家 and 民族，是帝国主义的本性。帝国主义存在一天，这种本性是絕不会改变的。因此，就帝国主义的本性來說，它是絕不願意接受和平共处五項原則的。只要有可能，帝国主义总是要破坏以至消灭社会主义国家，总是要侵略和奴役別的国家 and 民族。

历史表明，只是由于种种不利的客观原因，帝国主义才不敢冒險发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战争，或者被迫停战，接受某种程度的和平共处。

历史也表明，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間，始終存在着尖銳的复杂的斗争，有时甚至发生直接的軍事冲突和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以来，即使在不发生热战的情况下，帝国主义仍然不断进行冷战，帝国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是处在冷战共处的状态中。帝国主义国家在积极扩军备战的同时，总是千方百計地在政治、經濟、意識形态等方面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甚至进行軍事挑衅和战争威胁。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冷战，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反对这种冷战的斗争，这是国际范围内阶级斗争的表现。

帝国主义不但对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在全世界到处推行它們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鎮压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

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不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同帝国主义进行針鋒相对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时紧时松，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赫魯曉夫却不顾这些铁的事实，一味宣揚帝国主义已經承认和平共处的必要性，并且把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看作是同和平共处政策不相容的。

在赫魯曉夫看来，甚至当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派向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軍事威胁和武装进攻的时候，或者提出損害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和尊严的屈辱性要求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也还是只有退让再退让，迁就再迁就。

正是按照这种邏輯，赫魯曉夫把他在加勒比海危机中步步退让，拿原則作交易，俯首貼耳地接受美帝国主义的屈辱性要求，叫做“和平共处的胜利”。

正是按照这种邏輯，赫魯曉夫把中国在中印边界問題上坚持正确的原則，把中国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对印度反动派的武装进攻实行自卫反击，叫做“破坏和平共处”。

赫魯曉夫有的时候也讲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之間的斗争，但是，他是怎样看待这个斗争的呢？

赫魯曉夫說：“必須努力使两种制度之間不可避免的斗争变成只是两种意識形态之間的



斗争。”①

在这里，政治斗争不见了！

赫鲁晓夫还说，“列宁的不同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国家的和平共处原则意味着不仅没有战争，意味着不是暂时的、不稳定的休战状态。它以这些国家之间保持友好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为前提，规定建立和发展各种形式的和平国际合作。”②

在这里，任何斗争都不见了！

赫鲁晓夫像魔术师一样，变来变去，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抹煞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对立，抹煞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的根本矛盾，抹煞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把两种制度和两个阵营之间的和平共处变成了“全面合作”。

第二个问题：和平共处能不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必须体现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最根本的原则，必须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最基本的内容。

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最根本的原则是什么呢？这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

列宁说过：“同先进国家的革命者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结成联盟，反对所有的帝国主义者，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对外政策。”③ 列宁所提出的这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应当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指针。

在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以后，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要处理三个方面的关系，这就是：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关系，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

因此，在我们看来，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应当包括下列内容：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发展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援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这三项内容是互相联系的，缺一不可的。

苏共领导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的总路线片面地归结为和平共处，我们要问，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怎样处理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呢？难道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只是和平共处的关系吗？

当然，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必须相互遵守五项原则，绝不容许破坏兄弟国家的领土完整，绝不容许侵犯兄弟国家的独立主权，绝不容许干涉兄弟国家的内政，绝不容许在兄弟国家内部进行颠覆活动，绝不容许在兄弟国家关系中违反平等互利的原则。但是，仅仅实行这些原则，是远远不够的。一九五七年宣言指出，“这些原则是很重要的，但是还没有包括社

① 赫鲁晓夫 1960 年 1 月 14 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

② 赫鲁晓夫答奥地利教授汉斯·蒂林问，1962 年 1 月 3 日苏联《真理报》。

③ 《俄国革命的对外政策》。《列宁全集》第 25 卷，第 72 页。



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的全部实质。兄弟般的互相援助，是它们的相互关系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这种互相援助有力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

苏共领导把和平共处作为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这实际上就是意味着取消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互助合作关系，把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当作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看待，这也就是意味着取消社会主义阵营。

苏共领导把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片面地归结为和平共处，我们要问，社会主义国家又应当怎样处理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呢？难道掌握了政权的无产阶级，同还没有获得解放的阶级兄弟，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不是相互支援的关系，而仅仅是和平共处的关系吗？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曾经一再指出，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推进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根据地。斯大林也说过：“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革命，不应当把自己看做是独立自主的东西，而应当看做是用以加速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胜利的助力和手段。”“它是世界革命进一步发展的强大基地。”^①

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绝不能仅仅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关系，还必须正确地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还必须正确地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把支援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作为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作为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

同列宁和斯大林相反，赫鲁晓夫把和平共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这也就是从对外政策中排除了支援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这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任务。这绝不是对和平共处政策的什么“创造性发展”，而是借口“和平共处”，背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第三个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能不能作为全世界所有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能不能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

我们认为，和平共处指的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指的是独立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无产阶级只有在取得了革命胜利之后，才有可能和必要实行和平共处政策。对于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来说，他们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争取自己的解放，而不应该也不可能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实行和平共处。

因此，把和平共处引伸到被压迫阶级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同压迫民族的关系中去，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引伸为资本主义世界各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政策，或者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服从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都是错误的。

我们一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正确地执行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国

^① 《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44、347页。



家的力量，有利于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有利于团结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从而也有利于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同时，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直接打击和削弱侵略势力、战争势力和反动势力，有利于世界和平事业和人类进步事业，从而也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实现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正确地执行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同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利益是一致的。

但是，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同各国人民的革命，这毕竟是两类不同的问题。

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指出：“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这是一回事。和平共处根本不容许、也完全不可能触动共处国家的社会制度的一根毫毛。而各国的阶级斗争，民族解放斗争，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另一回事。这些斗争，都是为了改变社会制度的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革命斗争。和平共处根本不能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任何一个国家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只能经过本国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在阶级社会中，把和平共处看作是“解决社会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的最好的和唯一可行的道路”，把和平共处看成为“整个当代社会生活的基本法则”，这是完全错误的否定阶级斗争的社会和平主义，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明显的背叛。

早在一九四六年，毛泽东同志就对这两类不同的问题加以区别，并且明确地指出，苏联同美国、英国、法国在若干问题上达成的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①。

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方针。正是在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正确方针的指导下，中国人民毅然决然地把革命进行到底，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同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针相反，苏共领导把已经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在处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关系方面的政策，同全世界所有共产党的总路线混为一谈，企图用前者代替后者，要各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一律服从苏共领导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他们自己不革命，也要别人不革命，他们自己不反对帝国主义，也要别人不反对帝国主义。

关于这一点，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和赫鲁晓夫最近的一些讲话力图加以否认。他们说，指责苏共领导把和平共处引伸到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关系中去，是“骇人听闻的诽谤”。他们甚至装模作样地说，和平共处“不能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同资本进行的阶级斗争以及民族解放运动”。

但是，这种抵赖是没有用处的。

我们要问苏共领导：和平共处政策只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一个方面，为什么你们

^① 《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81页。



直到最近还说和平共处政策是“在世界范围内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整个时期的战略路线”^①呢？你们要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被压迫民族的共产党都把和平共处作为自己的总路线，这难道还不是要用你们的“和平共处”政策来代替各国共产党的革命路线，把和平共处政策任意引伸到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关系中去吗？

我们还要问苏共领导：各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只能主要地依靠自己的斗争，怎么能把这些胜利说成是以和平共处为前提，或者是和平共处的结果呢？你们的这种说法，难道还不是要把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从属于你们的所谓和平共处政策吗？

我们还要问苏共领导：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成就和在经济竞赛中取得的胜利，无疑会对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起着示范和鼓舞的作用。但是，怎么能够说，不是通过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而是通过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呢？

苏共领导鼓吹什么依靠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就可以给全部资本主义关系以“毁灭性的打击”，就可以在全世界实现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这实际上就是认为，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根本用不着进行斗争，用不着起来革命，用不着推翻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只要安安静静地等待着，等到苏联的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普天之下的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奴隶，就都可以同压迫者、剥削者一起，进入共产主义了。这难道不正是苏共领导要用所谓“和平共处”来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取消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吗？

从上面三个问题的分析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同苏共领导的分歧，是重大的原则性的分歧。这种分歧的实质在于：我们的和平共处政策是列宁主义的，是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为基础的，是有利于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的，是符合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的利益；苏共领导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是反列宁主义的，是抛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是有害于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的，是违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革命斗争的利益。

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适应美帝国主义的需要

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遭到了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各国革命人民的坚决拒绝，但是受到了帝国主义的热烈的赞扬。

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毫不掩饰他们对苏共领导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的欣赏。他们把赫鲁晓夫看作是“西方在莫斯科的最好的朋友”^②，说“苏联总理尼基塔·赫鲁晓夫的行动像个美国政治家”^③。他们说，“对自由世界来说，赫鲁晓夫同志被看作是俄国人最

① 苏联《真理报》1963年12月6日编辑部文章：《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一致》。

② 美国《时代》周刊文章：《我们对尼基塔必须友善到什么程度？》，1962年3月9日。

③ 美国副国务卿哈里曼1963年8月18日的电视谈话。



好的总理。他是真正相信和平共处的”^①。他们公开表示，“改善苏美关系的这种可能性，使美国国务院一些人士觉得，美国应当在某些限度内使赫鲁晓夫的任务得到方便”^②。

帝国主义一向敌视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叫嚷“共处这个字眼是既可怕又可恶的”，“让我们把这种暂时的、不自然的共处观念抛进垃圾堆”^③。为什么他们现在却对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总路线发生这么大的兴趣呢？这是因为，帝国主义已经看到，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总路线对帝国主义是有利的。

美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它的消灭各国人民革命，消灭社会主义阵营，独霸全球的战略目标，历来都是采取战争的与和平的两手策略。在国际形势的发展对它越来越不利的情况下，美帝国主义需要在继续扩军备战的同时，更多地玩弄和平阴谋。

杜勒斯早在一九五八年就提出，美国要全力以赴地执行“用和平手段取得胜利”的“高尚战略”^④。

肯尼迪上台以后，继承和发展了杜勒斯这一“和平战略”，并且大讲“和平共处”。他说，“我们需要一种比氢弹好得多的武器，……这种更好的武器就是和平合作”^⑤。

这是不是说，美帝国主义真的愿意接受和平共处，或者用苏共领导的话来说，承认了“和平共处的明智性和现实性”了呢？当然不是这样。

人们只要认真地分析一下，就不难看出美帝国主义所说的“和平共处”的真正的含义和目的。

它的真正含义和目的是什么呢？

第一，美帝国主义力图用所谓“和平共处”来束缚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的手脚，不许它们支持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杜勒斯说过：“就苏联政府而论，如果它摆脱国际共产主义的规定方向，而主要谋求俄国国家和人民的福利的话，它是能够结束‘冷战’的。同样，如果国际共产主义放弃它在全世界的目标，……‘冷战’也能结束。”^⑥

肯尼迪说过：如果要改善美苏关系，苏联就必须放弃“使全世界共产主义化”的计划，就必须“只照管它的本国利益，并且只照管使它的人民在和平的条件下过美好的生活”^⑦。

腊斯克说得更加露骨。他说，“在共产党领导人放弃他们的世界革命目标之前，是不可能获得有保障的持久和平的”。他还说，一些迹象表明，苏联领导人“对于他们对世界共产主义

① 英国《时与潮》周刊文章：《肯尼迪帮助赫鲁晓夫》，1963年4月18至24日。

② 法新社1963年7月14日华盛顿电，综述美国政府官员对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评论。

③ 美国前副国务卿狄龙1960年4月20日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演说。

④ 杜勒斯1958年12月4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商会的演说。

⑤ 肯尼迪1963年9月20日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说。

⑥ 杜勒斯1959年1月28日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发言。

⑦ 肯尼迪1961年11月25日同苏联《消息报》主编阿朱别依的谈话。



运动所承担的义务和加于他们的负担和風險抱有反感”。他甚至公开要求苏联领导人“撇开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幻想而从那里继续前进”^①。

这些话的意思是再清楚不过了。美帝国主义把资本主义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为争取自己的解放而进行的革命斗争，都说成是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全世界共产主义化”的结果。他们向苏联领导人说：你们希望同美国和平共处吗？可以的！条件是你们绝对不能支持资本主义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并且要负责使这些国家的人民不起来革命。这样，按照美帝国主义的如意算盘，就可以便利于他们放手地扑灭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的革命运动，把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人民都置于帝国主义的奴役和统治之下。

第二，美帝国主义在所谓“和平共处”的名义下，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力图实现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

杜勒斯说过：“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②。“处于守势是不够的，自由必须成为能够渗透进去的积极力量”^③。“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的演化”^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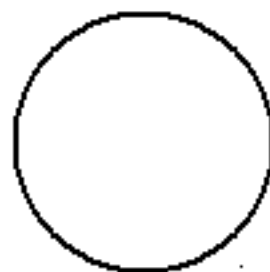
艾森豪威尔说过：美国将竭尽全力使用“和平手段”，“以便让那些处在独裁暴政束缚下的人民，能够最终享有自由表决来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⑤

肯尼迪说过：“我们的任务是，尽我们的一切力量”，使“苏维埃帝国以及各大洲正在发生的变化，都能给更多的人带来更大的自由，并且带来世界和平”^⑥。肯尼迪还宣布对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奉行一种耐心地鼓励自由、谨慎地压制暴政的政策”，以便为这些国家的人民提供所谓“自由选择”^⑦。

这些话也是非常清楚的。美帝国主义把社会主义制度诬蔑为“独裁”和“暴政”，把资本主义复辟说成是“自由选择”。他们向苏联领导人说：你们希望同美国和平共处吗？可以的！但是，这绝不意味着美国承认社会主义国家的现状，相反地，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恢复资本主义制度。这也就是说，对于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美帝国主义绝不甘心，它总是妄想要消灭一切社会主义国家。

总之，帝国主义的所谓“和平共处”的含义是：一切受帝国主义奴役和统治的人民不许争取解放，一切已经解放了的人民必须重新受帝国主义的奴役和统治，全世界都要统一到美国的所谓“自由世界大家庭”中去。

- ① 赫斯克 1963 年 9 月 10 日在美国退伍军人团全国大会上的讲话。
- ② 杜勒斯 1959 年 1 月 31 日在纽约州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的演说。
- ③ 杜勒斯 1958 年 12 月 4 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商会的演说。
- ④ 杜勒斯 1959 年 2 月 8 日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上的证词。
- ⑤ 艾森豪威尔 1960 年 9 月 30 日在芝加哥美籍波兰人大会上的讲话。
- ⑥ 肯尼迪：《和平战略》，第 199 页。
- ⑦ 肯尼迪 1960 年 10 月 1 日在美籍波兰人大会上的演说。



人們不難看到，蘇共領導的“和平共處”總路線，正好是投合了美帝國主義的口味。

蘇共領導借口“和平共處”，竭力討好美帝國主義，不斷地宣揚美帝國主義的代表人物“關懷和平”，這恰恰適應了美帝國主義的和平欺騙政策的需要。

蘇共領導借口“和平共處”，把和平共處引伸到被壓迫階級和壓迫階級、被壓迫民族和壓迫民族的关系中去，反對革命，取消革命，這恰恰適應了美帝國主義不許社會主義國家支持資本主義世界各國人民革命的要求。

蘇共領導借口“和平共處”，在國際範圍內用階級合作代替階級鬥爭，鼓吹社會主義同帝國主義“全面合作”，為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滲透大開方便之門，這恰恰適應了美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政策的要求。

帝國主義從來是最好的反面教員。在這裡，我們不妨把杜勒斯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以後說過的兩段話抄錄在下邊。

杜勒斯說：“有迹象表明，在蘇聯內部有要求較大的自由主義的力量”。“如果這種力量在蘇聯內部繼續發展，而且聲勢日大的話，那麼，我們就可以認為，也有理由希望，像我曾經說過的，在十年或者一代期間里，我們可以達到我們政策的偉大目標，這就是出現這樣一個俄國，它是由能夠反映俄國人民的願望、放棄了統治全世界的掠奪野心，並且遵循文明國家的原則和聯合國憲章中所體現的原則行事的人們所統治的。”^①

杜勒斯還說：“長遠的前景——說實在的，我要說，長遠的必然性是，蘇聯統治者們目前的政策將要有所演變，從而他們的民族主義的成分將要增加，而國際主義的成分將要減少。”^②

看來，杜勒斯的幽靈纏住了那些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人，以致他們簡直對所謂“和平共處”總路線着了迷，根本不願意想一想，他們的所做所為是多麼符合美帝國主義的希望。

蘇美合作是蘇共領導的“和平共處”總路線的靈魂

蘇共領導幾年來開口“和平共處”，閉口“和平共處”，實際上他們對待中國和其他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的態度，不僅是違反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的，而且也不符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蘇共領導所以不斷宣揚和平共處是他們對外政策總路線，說穿了，就是要所有社會主義國家，要全世界所有共產黨，都服從他們這些年來夢寐以求的蘇美合作。

蘇美合作主宰世界，這是蘇共領導的“和平共處”總路線的靈魂。

請看他們的妙論：

“現代兩個最偉大的強國——蘇聯和美國，把世界上任何一個其他的國家都遠遠地留在

① 杜勒斯 1956 年 5 月 15 日在記者招待會上的談話。

② 杜勒斯 1958 年 10 月 28 日在記者招待會上的談話。



后面。”①

“这两个国家中的每一个，率领着一大批国家——苏联率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美国——资本主义阵营。”②

苏联和美国“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我们为和平而联合起来，那么就不会有战争。那时，如果有某个疯子想挑起战争，我们只要用手指吓唬他一下，就足以使他安静下来”③。

“在苏联政府首脑尼·谢·赫鲁晓夫和美国总统约·肯尼迪之间达成协议，决定人类命运的国际问题就会得到解决。”④

我们要问苏共领导：美帝国主义是世界人民的最凶恶敌人，是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这一点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上是写得清清楚楚的，你们怎么能够同世界和平的主要敌人“联合起来”保障和平呢？

我们要问苏共领导：世界上有一百多个国家，三十多亿人口，难道都无权掌握自己的命运，都必须规规矩矩地听从苏美两个“巨人”、两个“最伟大的强国”的摆布吗？你们的这种狂妄的谬论，不是十足的大国沙文主义，十足的强权政治吗？

我们还要问苏共领导：你们当真以为，只要苏美两国达成协议，只要两个“大人物”达成协议，就可以决定全人类的命运，就可以解决一切国际问题吗？你们错了，完完全全错了！从古到今，从来就没有这样的事，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更不可能有这样的事。现在世界上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有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有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有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有帝国主义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难道苏美两国达成协议，这些矛盾就会消失了吗？

在苏共领导的心目中，只看得起一个美国。为了追求苏美合作，苏共领导不惜背弃苏联人民的真正盟友，不惜背弃至今还处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兄弟以及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

苏共领导极力破坏社会主义阵营。他们用尽一切造谣诽谤的办法攻击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施加政治的和经济的压力。对于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他们要置之死地而后快。他们同美帝国主义一道向革命的古巴施加压力，要古巴牺牲自己的主权和尊严。

苏共领导极力破坏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他们充当社会改良主义的传教士，瓦解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革命斗志。他们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破坏民族解放运动，越来越露骨地充当美国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

苏共领导为了追求苏美合作，费了这样大的力气，付出了这样巨大的代价，他们究竟从美帝国主义那里捞到了什么呢？

①② 尼·尼·雅科夫列夫著《三十年来……》（苏联为纪念苏美建交三十周年出版的小册子）。

③ 赫鲁晓夫1961年9月5日同美国记者苏兹贝格的谈话。

④ 葛罗米柯1962年12月13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



从一九五九年以来，赫鲁晓夫就对苏美两国首脑会晤着了迷。他在这个问题上不知做了多少好梦，散布了多少幻想。他热烈赞颂艾森豪威尔是一个“懂得大政策”的“大人物”^①，热烈赞颂肯尼迪“理解到这两个强大国家的政府所负担的重大责任”^②。苏共领导大肆宣扬所谓“戴维营精神”，大肆宣扬维也纳会晤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苏联报刊鼓吹说，苏美两国首脑坐在一起，人类历史就进入了“新的转折点”；这两个“大人物”一握手，国际关系就出现了“新纪元”。

但是，美帝国主义是怎样对待苏共领导的呢？戴维营会谈一个多月以后，艾森豪威尔公开宣布：“我不知道有任何戴维营精神”。戴维营会谈七个月以后，艾森豪威尔派遣 U—2 间谍飞机侵犯苏联，破坏了四国政府首脑会议。维也纳会晤以后不久，肯尼迪公然提出苏美二十年和平的狂妄条件，那就是，苏联不得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维也纳会晤一年多以后，肯尼迪下令对古巴实行海盗式的军事封锁，制造了加勒比海危机。

“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喧嚷一时的“戴维营精神”、“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国际关系的新纪元”，如此等等，现在究竟在哪里呢？

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订以后，苏共领导又大肆鼓吹所谓“莫斯科精神”。他们说什么要“趁热打铁”，并且说苏美达成进一步协议的“有利条件都具备了”，不应该采取“慢慢来”和“不着急”的态度^③。

究竟什么是“莫斯科精神”呢？我们不妨看一看最近发生的这样一些事情。

苏共领导为了进一步创造“苏美合作”的气氛，在莫斯科举行庆祝苏美建交三十周年的集会，同时又派了一个文化代表团到美国去进行纪念活动。可是，苏共领导的这种“热情”，得到了什么呢？美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全体人员拒绝出席莫斯科的庆祝会，美国国务院发出特别备忘录，要求美国公众抵制苏联文化代表团，并且指责他们是“最危险而可疑的人物”。

在苏共领导鼓吹什么“苏美合作”的时候，美国却派出间谍巴洪到苏联去活动。苏联政府逮捕这个间谍，本来是完全正当的。可是，在肯尼迪叫嚷说，美苏小麦买卖“要靠两国有合情合理的气氛”，“这种气氛因巴洪被捕而被大大破坏”之后，苏联政府就以“美国高级官员对巴洪命运的关怀”为理由，不加审判，急急忙忙把这个被宣布为“情报证实”“干了反苏间谍活动”的美国间谍释放了。

所有这些，难道就是“莫斯科精神”吗？如果这就叫做“莫斯科精神”的话，那实在是太可悲了。

莫斯科，这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首都的光辉名字，这个自从伟大的十月革命以来为全世界千百万人所景仰的光辉名字，今天竟然被苏共领导用来掩盖他们勾结美帝国主义的肮脏

① 赫鲁晓夫 1959 年 9 月 17 日在纽约市长的早宴上的讲话。

② 赫鲁晓夫 1961 年 6 月 16 日的广播电视演说。

③ 苏联《消息报》1963 年 8 月 21 日评论员文章。



勾当而蒙受了奇耻大辱！

总之，为了向美帝国主义乞求“友谊”和“信任”，苏共领导向美帝国主义不知说了多少好话，求了多少人情，向兄弟国家和兄弟党不知发了多少脾气，施加了多少压力，向各国革命人民不知玩弄了多少花样，进行了多少欺騙。但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他们从美帝国主义那里得到的，只是屈辱，屈辱，还是屈辱。

劝告苏共领导几句话

伟大的苏联人民，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在抗击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严酷的日子里，在卫国战争的熊熊烈火中，什么时候在困难面前低过头？什么时候在敌人面前下过跪？今天，世界上是一片大好革命形势，社会主义从来没有这样强大，帝国主义从来没有这样困难，可是，列宁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竟然被美帝国主义欺负到这步田地，社会主义阵营的荣誉竟然被苏共领导糟蹋成这个样子。我们同全世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全世界一切革命人民，怎么能不感到莫大的痛心呢！

在这里，我们愿意诚恳地劝告苏共领导几句话。

美国是最凶恶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帝国主义的战略目标是妄想征服全世界。它疯狂地镇压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它公开宣称要东欧重新回到所谓“自由世界大家庭”中去。你们怎么能够设想，按照美帝国主义征服全球的侵略计划，最沉重的打击只会落到别人头上，而不会落到苏联头上呢？

美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苏联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你们怎么能够设想，这两个社会制度根本对立的国家，可以实现什么“全面合作”呢？

美国同其他帝国主义大国之间，尚且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美国必欲把它们踩在自己脚下而后已，你们怎么能够设想，帝国主义的美国，会同社会主义的苏联融洽相处呢？

苏共领导同志们！请你们冷静地想一想吧，一旦世界上出现狂风暴雨，难道美帝国主义是靠得住的吗？不，美帝国主义是靠不住的，任何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是靠不住的。苏联的真正可靠的同盟者，只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国家，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只能是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

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和发展，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的发展，是任何人也扑灭不了，阻挡不住的。任何人背叛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背叛全世界人民，妄想同美帝国主义合伙来主宰世界，到头来是绝对不会有好下场的。苏共领导这样做，是极端错误和极端危险的。

悬崖勒马，为时未晚。现在是苏共领导抛弃你们那条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回到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的道路上来，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道路上来的的时候了。



信用合作社在我国现阶段的历史使命

邓子恢

我国的农村信用合作社，是一个有着亿万群众参加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经济事业，是与农村人民公社、供销合作社密切联系，相互促进，从而巩固农业集体化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组织。它是我国社会主义金融事业在农村信贷领域中，打击资本主义势力，巩固农村社会主义信贷阵地的重要力量，是国家银行的有效助手。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蓬勃发展，是正确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所阐明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结果。

信用合作社在社会主义阶段的重要作用

农村信用合作社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具有不同的性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是依附于资本主义经济，为地主、资产阶级垄断农业信贷、高利盘剥农民的剥削活动效劳的。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形式，是为劳动农民群众服务的集体金融组织。我国的农村信用合作社，远在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就在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中建立起来。全国解放以后，在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又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广泛的发展。

在农村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前，农村的劳

动农民群众由于还没有摆脱个体经济的束缚，还不能完全改变贫困落后的状况，在经济上还没有彻底翻身，农村的阶级分化仍是不可避免的。积极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社，就有利于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生活上缺少资金的困难，向高利贷活动作斗争，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实现农业合作化创造条件。因此，必须十分重视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社。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曾多次指出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社的重要性。一九二七年，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曾经指出：“合作社，特别是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确是农民所需要的。他们买进货物要受商人的剥削，卖出农产要受商人的勒抑，钱米借贷要受重利盘剥者的剥削，他们很迫切地要解决这三个问题。”^①其后，毛泽东同志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应该注意信用合作社的发展，使在打倒高利贷资本之后能够成为它的代替物。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中提出了发展生产、消费和信用合作社的任务。一九五三年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又强调指出：“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农村供销合作和农村信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42页。



用合作是农村合作化的三种形式。这三种合作互相分工而又互相联系和互相促进，从而逐步地把农村的经济活动与国家的经济建设计划联结起来，逐步地在生产合作的基础上，改造小农经济。”我国的农村信用合作事业，正是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指示，经过不断的努力而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实践证明，农村信用合作社不论在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国农村普遍建立了人民公社。在实现人民公社化以后，农村信用合作社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存在呢？实际生活已经作了肯定的回答：农村信用合作社不仅在当前是必要的，而且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内都需要存在，它对组织农村资金的余缺调剂，吸收闲散资金，帮助农民特别是贫农、下中农解决副业生产和生活上某些临时性的资金需要，以及支援集体农业生产，仍将发挥它的重要作用。

第一，现阶段的农村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组织，实行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的原则，并允许社员在不妨碍集体生产劳动的前提下，经营家庭副业和少量自留地，作为对集体经济的补充。同时，农村还存在着集市贸易，作为社会主义商业的补充。在集市上，允许生产队和社员在完成国家农副产品征购派购任务后，按照市场管理规定，进行农副产品的余缺调剂。与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特点和农业生产商品流通的这种情况相适应，农村信用合作社就有必要继续存在，并按照社会主义信贷政策，组织农村资金余缺的调剂，开展信贷活动。只要商品经济继续存

在，只要继续实行等价交换、按劳分配的原则，社员之间持有资金不平衡的状态就必然长期存在，这种群众性的资金互助组织，也就是不可缺少的。因此，作为社会主义集体金融组织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不仅有必要存在，而且大有可为。

第二，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会甘心灭亡，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的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他们一有机会就企图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这个斗争也必然在农村信贷领域中反映出来。因而在农村金融方面还将长期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要进行这场斗争，党和政府及其领导下的国家银行，就必须依靠由贫农、下中农联合中农所组织起来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是进行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有力武器，是在金融方面反击农村资本主义势力进攻的劲旅。因此，积极领导农村信用合作事业，大力加强农村信用合作社，这是关系到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重大问题。任何削弱或取消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想法和作法，都不利于防止和打击高利贷，不利于击退资本主义的进攻，不利于贫农、下中农的阶级利益，不利于巩固集体经济，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因而也是不正确的。我们必须牢牢记住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再教导的：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



甚至是很激烈的。因此，我們就絕不能削弱农村信用合作社，而要进一步办好信用合作社，巩固农村的社会主义信貸陣地。

第三，农村信用合作社是国家銀行开展农村信貸工作，調节貨幣流通的有力助手。現阶段农村人民公社主要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国家銀行在农村的信貸活动，主要是以生产队为对象。但是，国家銀行現有的农村营业机构和人員，要直接联系所有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是有困难的。目前国家銀行对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信貸业务，約有百分之六十左右是通过农村信用合作社办理的，对社員个人貸款則全部通过信用合作社，在农村举办儲蓄业务也需要通过信用合作社与高利貸斗争才能顺利开展。因此，信用合作社实际上成了国家銀行在农村进行信貸业务的有力助手。大家知道，商品交换是現阶段农民可以接受的經濟联系形式，而商品交换是以貨幣为媒介来实现的，这样就經常有大量的貨幣在农村流通。因而农村貨幣流通的状况如何，对全国市場的貨幣流通影响甚大。当然，从整个來說，貨幣在农村的出籠和回籠，主要是取决于工业品的供应和农副产品的收购数量。但是，銀行、信用合作社在农村开展的信貸和儲蓄活动，对于有计划地調节貨幣流通，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通过农村信用合作社在存款、放款业务方面广泛联系群众，对于組織調剂散布在亿万戶农民手中的零星貨幣，尤有显著的作用。

从以上几方面可以看到，农村信用合作社之所以有必要繼續存在，是适应現阶段农村社会經濟的客观需要的，它是关系到巩固工农联盟，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和农村两条

道路斗争的大問題，是能否有效地运用信貸这个工具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的問題。当前指导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正确方針，应该是加强领导，积极办好，认真整頓，巩固发展。

信用合作社的基本任务

建国以来，党和政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各个不同时期，对于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任务，都曾作过明确的指示。一九五三年党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決議》中指出：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任务是，在国营經濟的领导下帮助农民摆脱高利貸剝削，发展农村儲蓄和低利貸款，为农村生产服务，促进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发展。同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发放农业貸款的指示》中指出：应该积极組織农民的信用合作，和高利貸者作經濟斗争，逐漸縮小高利貸者的剝削陣地，直到最后消灭高利貸。《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綱要》中規定：“巩固农村信用合作社，积极开展农村信貸业务和农村儲蓄业务，帮助农业合作社和农民解决短期資金周轉的需要。”从党和政府历次的指示中可以看到，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基本任务，是在国家銀行的领导下，依靠貧农、下中农，联合中农，开展存款、放款的信貸活动，帮助有困难的社員解决生产和生活困难，向高利貸作斗争，同时支援集体經濟，发展农业生产。党对农村信用合作社所提出的这些基本要求，不仅在过去是适用的，而且在今后一个很长时期內仍然是适用的。

高利貸是生产資料私有制的产物。在旧社会里，地主、資本家的殘酷剝削，迫使广大劳动农民陷于貧穷破产的境地，而高利貸



如同馬克思所指出的，它像寄生虫一样吸吮着农民的血汗，而又使他們牢牢地依附在地主的土地上。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高利貸对农民的剝削更为殘酷，它是劳动农民穷困和遭受灾难的重要原因之一。消灭高利貸的根本途徑在于，打倒反动阶级的統治，消灭生产資料的私有制，并进一步引导农民經由集体化的道路，走向共同富裕。我国的情况正是这样的。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以后，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經過土地改革，以及通过互助組、初級农业社和高级农业社等一系列的步骤，引导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而后又建立了人民公社。这是消灭高利貸剝削的根本保障。但是，由于我国当前的农业生产水平还很低，还不能在更大程度上摆脱自然灾害的威胁，农民的收入水平还不高；由于現阶段的农村人民公社仍是实行等价交换、按劳分配的原则，社員之間劳动力多少、强弱和收入不尽相同，这就仍然存在着一部分人資金不足而需要借貸，另一部分人資金有余的情况。这样，群众之間互通有无的利息不高的借貸，当然允許合法存在。但是，非法的高利貸活动，也就有可能伺机而起。

正因为上述情况，我們防止高利貸活动的根本問題在于，巩固农村人民公社，发展农业生产，并在逐步实现农业技术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增加农民收入，为农村人民公社向高级阶段发展和农民进一步共同富裕創造物质条件，从而也就从根本上消除了高利貸产生的可能。但是另一方面也必須看到，实现上述的宏伟目标需要有一个很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尤其

是在遇到災荒歉收的情况下，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和貧农、下中农社員，在生产和生活上难免还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这就要求农村信用合作社在国家銀行的领导下，能够帮助有困难的社員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資金需要，并多方面帮助生产队克服困难，有力地支援集体經濟，发展农业生产。

总之，既要巩固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經濟、发展农业生产，为最終消灭高利貸創造物质基础，同时又要办好农村信用合作社，防止高利貸活动，以支援社員生产生活，支援农业集体經濟。这两方面的工作要很好地統一起来，不能有所偏廢。

綜上所述，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基本任务，应该是：

第一，依靠貧农、下中农，联合中农，开展信貸活动，积极帮助有困难的社員解决生产、生活上的資金困难，防止高利貸活动，直至最后消灭高利貸。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資金运用計劃，要注意与国家銀行的貸款計劃密切配合，互相銜接。应该尽先把信用合作社的資金，用于帮助有困难的貧农、下中农社員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信用合作社資金不足的，銀行应給予支持；信用合作社資金有余的，也可按照国家規定的貸款政策，直接对生产队发放貸款。但是，信用合作社直接办理生产队的貸款业务时，注意不要使生产队占用信用合作社的資金过多，以免影响对社員生产和生活貸款的主要业务。

第二，办理农村儲蓄，吸收农村閑散資金，調节农村货币流通。

第三，积极配合国家銀行，用好、管好国家支援农业生产的各項資金，协助国家銀



行做好对生产队的贷款工作，以支援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

依靠贫农、下中农阶级队伍 办好信用合作社

依靠谁办好农村信用合作社，这是在方针、任务确定后，必须解决的组织路线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再教导我们，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必须依靠真正可靠的力量，才有可能争取尽可能多的同盟者，才有可能孤立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敌人。那么，谁是办好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真正可靠的依靠力量呢？

从根本上说，办好农村信用合作社必须依靠贫农、下中农这支阶级队伍，这是办好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社会基础。贫农、下中农是农民中的多数，是农村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他们在旧社会受地主、高利贷的剥削最厉害，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最积极的拥护者，信用合作社也主要是根据他们的需要来办的。依靠贫农、下中农是我们党在农村进行一切工作所应遵循的阶级路线，办好农村信用合作社也必须切实贯彻执行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把农村信用合作社的领导权切实掌握在贫农、下中农的手中。农村信用合作社的领导机构，诸如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应该牢固树立贫农、下中农的绝对优势，信用合作社社员小组要由贫农、下中农来担任组长。对于混入信用合作社组织中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必须坚决清洗出去，以纯洁信用合作社的组织。信用合作社在制定业务方针、计划和进行信贷活动时，必须充分听取贫农、下中农委员会（或小组）的意见，与他们商量研究，把信用合作社的各项

业务活动置于贫农、下中农组织的监督之下。总之，农村信用合作社只有依靠贫农、下中农，才能联合和团结中农，才能孤立高利贷者，才能切实办好信用合作社，并使之在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除了依靠贫农、下中农阶级队伍办好信用合作社之外，还必须加强和整顿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干部队伍。要办好农村信用合作社，没有一批政治可靠、热心信用合作事业、在群众中有威信并对业务熟悉的干部是不行的。目前全国农村的信用合作社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他们充满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密切联系群众，任劳任怨，埋头工作，正在成长为又红又专的干部，得到了群众的好评。但是，也还有一部分信用合作社的干部，有的是由于政治学习不够，思想觉悟不高，在遇到某些困难的情况下，患得患失；有的是不善于依靠党、政领导，依靠群众，工作局面打不开，有畏难情绪；还有的是由于经常被抽调做其他工作，无法开展信用合作社的业务；等等。今后必须切实贯彻执行阶级路线，纯洁组织，整顿干部队伍，加强对干部的政治思想和阶级斗争的教育；培养和提高干部的政策水平和业务水平，总结经验，改进工作方法；关心信用合作社干部的生活福利。为了便于信用合作社干部积累工作经验，发挥创造性，还必须使信用合作社系统的干部稳定下来，同时也不要随便临时抽调他们去做别的工作。应该明确认识，信用合作是农村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中金融战线上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信用合作社的干部队伍得不到加强，就会削弱社会主义在农村的信贷阵地，影响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影响解决贫农、下中农生产生活



的困难，不利于防止和打击金融战线上的资本主义进攻。这对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极为不利的。

信用合作社的组织形式

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组织形式，应根据群众性组织的特点和它所担负的基本任务，从便于接近群众，便于群众存款取款，便于群众贷款还款，便于群众监督的原则出发，因地制宜地设置，多种形式并存，不必强求一致。就各地的经验看来，大致可以有以下几种形式：

第一种，是按公社设立信用合作社，按大队或几个大队联合设立信用分社或信用服务站，生产队设立信用合作社社员小组。这种组织形式适合于按原来大乡范围设立的公社，实行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制的地区。它的优点是便于公社党委的领导，便于与农业生产等各项工作密切配合，同时由于社区范围大，业务量较大，费用开支比较节省。缺点是中间环节多，领导不方便。如果不设立中间环节机构，群众存款取款又不方便，会影响业务开展，并且不便于群众监督和实行民主管理。

第二种，是按大队或几个大队联合设立信用合作社，在生产队设立信用合作社社员小组，在公社一级设立联社。这样设立的信用合作社，它的社区范围大致相当于公社化前按小乡设立的信用合作社。这种组织形式的优点是社的辖区较小，存款取款方便，便于群众监督和实行民主管理。问题是占用脱离生产的干部较多些，并有一部分信用合作社的费用开支有困难。一般地说，费用开支的问题经过改善经营管理，积极开展业务，

是可以解决的。

第三种，在某些地区公社范围很小，公社以下不设大队的，则可以按公社设立信用合作社，在生产队设立信用合作社社员小组。公社所属生产队比较多的，可由信用合作社于部分片包干，经常到小组去办理存放款。

第四种，是在渔区、牧区、少数民族集中居住地区，以及少数与全民所有制农场合并在一起经营管理的公社，信用合作社的组织形式，也可以适应地区的特殊情况，与一般农业地区有所不同。

总之，农村信用合作社组织形式的研究和确定，必须注意以下两个原则：

第一，农村信用合作组织的设立，既要便于领导，又要便利群众；既要注意到便利存放款业务的开展，又要注意到与供销社、粮食等财贸部门的工作配合；既要注意现行的行政区划，又要考虑到自然地理条件、传统的经济联系和信用合作社的原有基础。一般地说，应该更多地考虑作到便利群众，便于开展存款放款业务。

第二，确定信用合作社的组织形式，应认真贯彻群众路线，听取群众意见，不能由少数干部自行决定。信用合作社是群众性的资金互助组织，究竟如何设立，应集中群众意见，提出几种方案，说明利弊，让群众反复讨论，互相比对，然后再提交社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这是关系到是否认真贯彻执行民主办社方针的重大原则问题，不能忽视。

信用合作社的组织领导 及其与国家银行的关系

农村信用合作社是群众性的资金互助合



作組織，它应当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由社員当家作主，实行民主办社。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信用合作社的最高权力机关是社員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由社員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

第二，信用合作社章程由社員代表大会民主討論通过。

第三，信用合作社的組織机构、人員編制、貸款限額、信貸計劃、利息标准、干部福利待遇等重大問題，都要經由社員代表大会討論确定。

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則，实行民主办社，是尊重集体所有制經濟的財权、人权、經營管理权，从而調动群众的积极性，办好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保证。經驗证明，信用合作社凡是能認真贯彻执行这项原則的，就能够做到群众拥护，組織健全，业务开展，否則就会脱离群众，組織涣散，业务停頓。

现阶段，我国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只有单独核算的基层組織，而没有其上級联社机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銀行作为国家的金融管理机关，要負責指导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业务活动。信用合作社业务上的重大事項，諸如确定貸款政策、制定資金运用計劃、調整存放款利率等，都要提交社員代表大会討論通过后，报銀行审查批准。銀行还要协同地方党委，做好信用合作社干部的配备、訓練等組織工作和思想工作。

銀行和信用合作社是社会主义經濟的两种不同形式。一个是全民所有制經濟，一个是集体所有制經濟。国家銀行是領導力量。两者既要相互支援，共同发展，以巩固社会主义

的农村金融战綫，促进整个国民經济的繁荣，又要承认两种所有制的差别，划清界限，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銀行要从資金上、人力上积极支援信用合作社，成为信用合作社强大的后盾，信用合作社要在国家銀行的领导下，充分发挥开展农村信貸业务，防止高利貸活动的助手作用。国家銀行应该从政策上、业务上加强对信用合作社的领导和帮助，但又不能包办代替，要注意从經營管理、資金运用、干部人选等方面，帮助信用合作社贯彻执行民主办社原則，尊重群众意見。銀行在与信用合作社的經濟往来中，应该按照互利原則，存款計算利息或付給手續費，以发挥信用合作社独立自主經營的积极性，维护集体所有制經濟的正当利益。信用合作社在經營上，則应依靠群众，勤儉办社，力求做到自力更生，不依賴国家。事实证明，凡是办得好的信用合作社，都能做到开支自給或基本上自給。同时，也有不少信用合作社还提留了为数可观的公共积累。当然必須看到，国家的援助也是不可少的。在信用合作社遇到农业生产因災减产，資金周轉不灵，或經濟条件較差，存款来源較少，暂时不能維持开支等困难情况下，国家銀行应该予以适当支持，满怀热情地帮助信用合作社克服困难。

信用合作社的整頓巩固工作

农村信用合作社要经常不断地整頓和巩固，这是信用合作社健康发展的一条重要經驗。目前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經營管理情况大多数是好的或基本上好的。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信用合作社办得不好或者很不好。各地农业銀行应该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下，抓



紧时间，经过调查摸底，分类排队，制定规划，分期分批地进行整社工作。

为了做好整社工作，首先，要引起各级党、政领导和银行的高度重视，使大家深刻认识到，农村信用合作社是农村金融战线上国家银行的有力助手，是贫农、下中农在生产生活上的资金互助组织，是防止高利贷活动的一支劲旅。只有明确认识，引起重视，信用合作社的整顿工作才有可能逐步开展起来。

其次，要建立整社的领导机构，组成整社队伍。目前农业银行已经成立，各地党委应迅速把各级银行，特别是县支行的信用合作部门配备起来，以此作为整顿信用合作社的县领导机构，并调配得力干部作为整社队伍，在党委领导下经过试点，逐步推广，分期分批地整顿全县的信用合作社。

第三，必须保障信用合作社的资金所有权。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资金为信用合作社的全体社员所有，任何机关、企业和个人不得抽调。凡是违反政策规定抽调了信用合作社的股金、公积金、存款等各项资金的，应区别情况认真加以处理；凡是国家各部门动用了信用合作社资金的，应由有关国家部门负责清理归还；凡是国家银行放出的贷款，而转作信用合作社贷款的，应如数冲转银行，并退回所占信用合作社的资金；凡是国营商业、粮食等部门与社队所发生的债务关系而转作信用合作社的贷款的，应由有关部门负责清理，并退回所占用的信用合作社的资金。必须强调，任何机关团体企业，都不得违反政策和制度的规定，随意抽调、动用信用合作社的资金，以切实保障信用合作社集体经济的所有权。

第四，要彻底清理账目，收回挪用资金，

建立和健全资金管理制度。要根据中央规定的政策，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依靠贫农、下中农，在信用合作社组织中认真进行清理账目，清理债权债务，清理资金的“三清”工作。对于不正当占用的资金和拖欠的贷款，应立即清理收回，暂时无力归还的，应定出还款计划，限期收回；对于贫农、下中农的困难户，确实因生活困难较大，无力归还到期贷款的，经过清理后应主动照顾，缓期收回。经过“三清”后，要建立和健全资金管理制度，任何单位、任何个人，不得违反制度，随意挪用信用合作社的资金。信用合作社的干部，有权拒绝那些违反制度动用库款和贷款的要求。此外，在一部分老灾区、经济贫困地区和困难较大地区的信用合作社，经过“三清”整顿后资金仍甚困难，国家银行应该积极地设法给予支持，使其在业务上逐步活动起来。

第五，整顿信用合作社组织，纯洁干部队伍，健全民主管理制度。凡是信用合作社缺乏专职干部，或虽有专职干部但长期调做其他工作的，应迅速调回原干部或另配干部加以充实；凡是信用合作社人选不当的，应适当调整。信用合作社的领导权一定要掌握在贫农、下中农的手里，社员代表会、理事会、监事会应该树立贫农、下中农的政治优势。对于信用合作社的干部，要挑选政治可靠，热心信用合作事业，在群众中有威信的人来担任。同时，要建立和健全社内的各项民主管理制度，加强群众对社务、业务和财务的监督。

第六，要解决某些信用合作社干部生活的实际困难，适当调整干部工资待遇。农村信用合作社与供销合作社同是集体经济组织，其干部的工资、福利待遇，原则上应该



与农村基层供销社干部的待遇一致起来。

第七，要结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启发广大群众的阶级觉悟，发动贫农、下中农群众经常进行防止和打击高利贷活动的斗争，积极地树立信用合作社在群众中的威信。为了加强信用合作社的资金力量，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适当扩大股金是必要的。存款是信用合作社资金的主要源泉，股金积累是巩固信用合作社必要的物质条件，两者都不应该忽视。通过整顿，凡是有条件的信用合作社，都应该按社章规定给社员分红，以昭信守。信用合作社应积极举办储蓄，吸收存款，以回笼货币，这是农村金融战线上的一项很重要的工作。

加强党对信用合作社的领导

党是一切工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党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各级组织，是社队的领导力量和核心力量。加强党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的领导，是巩固和发展信用合作社的根本保证。农村信用合作社是一种群众性的组织，分布在广大的农村，它是与农业生产、群众生活密切相关，而为农村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服务的经济工作，它必须在各级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开展信贷活动。银行、信用合作社应该经常向地方党组织汇报农村资金余缺情况，信贷计划的执行情况，以及社务组织工作等情况，以便能在工作上得到党委的指示和支持，并将信用合作社的业务工作纳入农村各项工作的统一部署中去，使它更好地为党在农村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服务。农村信用合作社只有紧紧地依靠党的领导，才不致迷失方向，保证办得好。

地方各级党组织在领导农村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需要组织各个战线的力量，农村金融战线则是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因此，地方党组织加强农村信用合作社的领导是十分重要的。要把信用合作社的工作列入自己的议事日程，切实监督银行、信用合作社贯彻执行中央所确定的有关政策和指示，执行上级业务部门所批准的章程、规则、制度、计划；关心信用合作社的工作，关心信用合作社干部的政治思想情况和生活情况，经常加强对信用合作社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问题；注意挑选政治可靠、群众拥护而又有一定能力的干部加强信用合作社组织，并使他们较长期地稳定下来，成为又红又专的干部。这样就能更好地发挥信用合作社的职能作用，为党在农村的中心工作服务。各地经验证明，地方党组织能从以上几个方面加强对信用合作社的领导，信用合作社就能办得好，就能够更好地为农村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服务。

整顿信用合作社工作，是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方面，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这是个很大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如果只靠银行、信用合作社干部，而没有各级党组织的强有力的领导和贫农、下中农的支持，是不可能完成的。因此，必须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组织银行、信用合作社的干部，依靠贫农、下中农的阶级队伍去进行。各地要在党委的领导下，结合社会主义教育，制定整顿信用合作社的规划，组织干部力量，统一行动，善始善终，切实把整顿信用合作社的工作做好，以迎接我国农业生产正在出现的新高涨的大好形势。



新老殖民主义者争夺刚果的真相

· 苑 文 ·

列宁一九一六年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曾经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特点是最大企业家垄断同盟的统治。一旦所有原料的来源都掌握在某些人的手里，这种垄断同盟就巩固无比了。……资本主义愈发达，原料愈缺乏，竞争和追逐全世界原料来源的斗争愈紧张，那末占据殖民地的斗争也就愈激烈。”^①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各国垄断资本为争夺原料产地而进行的殊死斗争，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内部关系中的一个必然现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在一系列国家中取得胜利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大大缩小了帝国主义的统治地盘，它们彼此为了击败竞争对手和巩固自己的地位，在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方面的斗争，更发展到空前尖锐的程度。多少年来，帝国主义在刚果所进行的激烈的争夺战，正是它们之间瓜分原料产地和势力范围的斗争日益加剧的缩影。

刚果是非洲自然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

一，素有“世界原料仓库”和“中非宝石”之称。特别是在稀有金属和有色金属等战略矿产方面，它更占有重要的地位。例如工业用钻石、半导体的重要原料锗、制造导弹和喷气式飞机必不可少的钴、钽等，产量都占资本主义世界第一位，锡占第四位，铜和锰占第五位。此外，刚果还是帝国主义铀原料的一个重要产地。其他如制造热核武器所需的铀、钼、镉、铍、钍，以及金、银、钨、锌等，储藏量也很丰富。除了矿物资源，刚果还拥有丰富的农业原料，如棕榈产品、橡胶、棉花、咖啡、可可等，每年都有大量出口。

刚果地处非洲中心，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为帝国主义国家在非洲扩张各自的势力范围的必争之地，从一八八四——一八八五年帝国主义举行瓜分非洲的柏林会议以来，一直是帝国主义在非洲角逐的中心。在那次会议上，由于各大国谁都不愿意让刚果被强大的对手所独占，因此在决定与会各国共同享有在刚果的航行和贸易自由的权利后，将管辖权交给了小国比利时。

^① 《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52—253页。



近八十年来，比利时一直把刚果作为自己的摇钱树。它不仅依靠从刚果掠夺来的大量廉价原料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而且还用来补充换取外汇所需资源的不足。在比利时的出口总值中，差不多有十分之一是从转售刚果原料得来的。据统计，一九五五年比利时股份公司在纳税后的利润中，有百分之三十以上是来自刚果。在刚果拥有巨额投资的比利时四大垄断财团——比利时总公司、布卢菲纳集团、安班集团和康米尼埃尔公司，控制或影响着刚果百分之八十五的公司。其中最大的是比利时总公司，据估计，它在刚果的投资超过了其他三个财团投资总和的三倍以上。

除比利时外，英国垄断资本在刚果也拥有雄厚的经济势力。刚果的保险业几乎完全控制在英国资本手中。英国尤尼莱佛集团是刚果棕榈产品的垄断者和橡胶、可可生产的最大经营者，其中仅棕榈一项就占刚果出口总值的百分之十一。这个集团还掌握着刚果进口额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在刚果的主要经济部门采矿业中，英国垄断资本也有巨额投资，并凭借英国在整个中非、东非和南非的政治经济势力，而成为刚果采矿业的实际操纵者。例如，以英国为第二大股东的上加丹加联合矿业公司，就完全垄断了刚果的铜、钴、锌、镭、铀以及其他稀有金属的开采和初步加工，其矿产出口值占刚果出口总值的百分之五十左右。这家公司的出口物资有一半是由英国资本的运输系统承运的。另外，英国南非奥本海默财团还享有刚果全部钻石的

专卖权。

美国垄断资本对刚果的丰富资源垂涎已久。当一九〇六年上加丹加联合矿业公司成立时，力图取得全世界铜垄断地位的美国铜业托拉斯，就曾想挤进去，但遭到英、比资本的拒绝。其后，在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的安排下，美国葛根汉集团始在美国刚果公司和刚果国际林业与矿业公司中，分别得到百分之五十和百分之二十五的股份。尽管如此，美国在刚果的利益还是长期受到在刚果的经济中占优势的英、比两国势力的抑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帝国主义为了霸占刚果这个资本主义世界当时最大的原子工业的原料产地，利用自己在大战中所处的有利地位，迫使英、比两国与之签订协定，承认美国对刚果铀矿的管理权，并且规定美国有权获得全部产量的四分之三，下剩四分之一给英国。可是这个协定开始执行以后，英国就被迫把自己的份额让给美国。但整个说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刚果的经济命脉仍然掌握在英、比垄断资本手里。据统计，到一九四三年，美国在刚果（包括卢旺达、布隆迪）的投资只有六百五十万美元，远远少于英国和比利时资本。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利用西欧国家普遍削弱的机会，加紧排挤老殖民主义者的势力，而拥有丰富资源和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刚果，更是它势在必争之



地。特别是，美国制造原子武器和发展军事喷气技术，迫切需要从刚果进口大量的稀有金属，这就决定了刚果对美国的意义。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就曾这样露骨地说过：“如果我们从刚果、中东和苏伊士运河丢掉了，‘我们从哪里能够得到为维持我们的生存、为制造钢铁和制造原子弹所需的原料呢？’”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在一九五九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也赤裸裸地供认：“刚果的矿藏对于美国的工业和军事需要有很大贡献，我们和刚果的未来关系必须能保证这些矿产品的继续供应。”

为了把刚果丰富的矿产原料控制在自己手里，美国垄断资本竭力想打进刚果的重要采矿公司，特别是为英、比垄断资本控制的上加丹加联合矿业公司。一九五〇年，英国英格兰银行出卖法国抵偿英国战债的坦噶尼喀租让公司的股票，美国垄断集团曾企图把这笔股票全部购买过来，以便通过这家上层持股公司间接控制上加丹加联合矿业公司。但由于英国垄断资本的严密防范，这笔股票的大部分都落入英国与比利时垄断资本之手，只有百分之八的股份为美国垄断集团所获得，远不足以形成对这家公司的控制。不仅如此，英国政府还规定，在十年内，未经英国政府准许，坦噶尼喀租让公司在上加丹加联合矿业公司所掌握的股票，不得任意出售或转让；如果出售，英国政府有优先购买的权利。这样，美国要想控制上加丹加联合矿业公司就更加困难了。

列宁曾经指出，“财政资本不仅重视已

经发现的原料产地，而且重视可能发现的产地”^①。美帝国主义在加紧对刚果已开发的矿藏进行渗透的同时，还力图设法把那些尚未开发的矿藏也控制起来。但是，这也同样受到英、比垄断资本的抵制。

刚果广阔的中部和西部地区，特别是刚果河下游的下刚果地区，是一个地下资源还没有开发的处女地。这个地区同加丹加一样，蕴藏有大量的铜、铀、锰、锡、铁等矿物资源，而且还有在加丹加尚未发现的铁矾土矿藏（估计储量在五亿吨左右），以及占世界总储量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的水力发电潜力。比利时早在二十年代就对这里的资源进行过勘察，并提出了关于建立水力发电站等工程的“英格计划”。这一计划如果实现，下刚果地区不仅将成为非洲的“鲁尔”，大大有利于发展各种巨型冶金、电力化学和原子工业，而且整个刚果也将因其在经济上具有压倒优势而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抱有囊括非洲野心的美帝国主义者，对英格水力发电工程计划一开始就抱有浓厚的兴趣。据估计，这个计划的全部投资将达三、四十亿美元，只有美国才有能力负担得起，这就更助长了美国垄断资本插手的野心。

一九五四年二月，美国援外事务管理署派遣了以孟山都化学公司前董事长兰德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英格进行现场考察，并酝酿组织兴建水力发电工程的公司。美国这一行

^①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53页。



动引起了英、比壟断資本的警惕。他們担心如果英格計劃实现和下剛果采矿业建立起来，其異常低廉的电力和地处海口的运输便利，将使加丹加采矿业不可能与之抗衡。因此，他們宁可暫不开发或分批分期开发这里的水力和矿产资源，也不願让美国插手。按照美国《柯里尔》杂志的說法，这些壟断者是“打算把英格和下剛果的矿藏保留給自己的孙子們”。

英、比老殖民主义者对于美帝国主义利用强大的財力来挖自己牆脚的作法，一直存有戒心，并且公开表示不滿和抗拒。英国在海外的广播电台就曾抱怨說：“如果让美国投入太多的資本，那么非洲丰富的矿产在开采以前就已經是美国人的了。……我們絕不能存在任何片刻的幻想，似乎受美国黄金灌溉的非洲会长成英国的玫瑰。”一九五五年，比利时殖民部甚至还发布了一項受到英国支持的关于限制外資的特別声明，規定比利时資本今后在剛果建立的所有新公司中所占的比重不得少于百分之五十一，而且公司的經營管理必須由比利时人担任。

但是，經濟、政治实力已經大大超过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美国帝国主义，是不会忍受这种抵制的。它們迫不及待地要求把剛果从老殖民主义者的手里夺取过来，使其变成完全受自己支配的势力范围，从而更有把握、更可靠地控制剛果的原料，打击自己的竞争对手。

利用老殖民主义者的殖民統治发生动摇的机会，借口所謂“填補真空”，把老殖民主

义者从他們自己的陣地上排挤出去，取而代之，从来就是美国帝国主义推行新殖民主义所慣用的手法。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在談到他所謂的“未見分曉的地区”时，就曾毫不掩飾地說，“机会最丰富的地方莫过于动荡不安的南非联邦以北和撒哈拉大沙漠以南之間的地区”。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肯尼迪还认为，为了“直接同非洲各国接近”，“即使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一部分国家发生磨擦”，也在所不惜。

一九五九年一月，比利时殖民者在剛果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爭取民族解放斗争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宣布在原則上同意剛果独立。美帝国主义立即利用出現这一所謂“权力的真空”的机会，在剛果大肆活动，一面派出大批官員訪問剛果，物色代理人；一面派出代表团考察所謂“技术援助”的可能性，积极进行“接管”剛果的准备。

美国新殖民主义者企图控制剛果的阴谋活动，引起了英、比老殖民主义者强烈的反对。但是，在剛果已經独立和难以在剛果全境与美国相抗衡的情况下，他們被迫采取了固守剛果东南部采矿地区、特别是固守加丹加地区的办法，以保持它們的既得利益。

加丹加是剛果財富最集中的地区，它占有剛果矿产的百分之八十，被称为“地质学上的奇迹”和“剛果的乳牛”。英国和比利时在剛果的投资很大一部分都集中在这个地区。剛果政府的全部財政收入，也有一半左右是来自这里。

加丹加还是英、法、比、葡、南非等国



壟斷資本集團在中、南非地區的“礦業帝國”的重要一環。這個礦業帝國以英國南非公司為樞紐，用交叉投資、互派董事等辦法，將諸如英、法兩國的羅斯柴爾德集團、英國南非的奧本海默集團、比利時總公司以及其他國際壟斷集團組合在一起，共擁有約五十億美元的資本。它控制着南非、北羅得西亞、南羅得西亞、安哥拉以及剛果東南部廣大地區的採礦業，壟斷着資本主義世界黃金生產的百分之七十五，銅的百分之二十五，鈷的百分之八十，幾乎全部的工業用鑽石和至少百分之六十以上的鈾；而其中銅的百分之四十，鈷的百分之八十，鑽石的百分之八十及鈾的很大部分，都產自加丹加及开赛省南部。因此，加丹加的得失，直接關係到老殖民主義者在整個中非、南非的經濟障地是否會被動搖的問題，如果失去加丹加，也就必然意味着這個老殖民主義者的礦業帝國“基本完蛋”。

但是，對美國新殖民主義者來說，加丹加也是一塊必爭的“肥肉”。正如美國《紐約時報》所招認的：“加丹加對能夠控制它的財富的任何人來說，是一個大家爭奪的好東西。”現在，美國所需要的許多重要原料都越來越仰賴於這個地區。一九三七年，美國從剛果掠奪的原料總值只不過三百萬美元，但到一九五七年就激增了三十三倍，達一億零三百萬美元，這還不包括從英、比兩國轉口的數字。

不僅如此。美國奪取加丹加的目的，還在於用控制原料產地的辦法，來剝奪敵方進

行競爭的可能性，以利于巩固自己的壟斷地位。在美國壟斷資本看來，英、比壟斷資本在加丹加擁有豐富的礦產原料，對自己是很不利的。例如，加丹加的銅的生產就直接威脅着美國銅礦托拉斯的利益。加丹加的銅礦和英國控制的北羅得西亞的銅礦脈相連，蘊藏量居於世界主要銅集中產地的首位，含銅率高出美國國內銅礦二到五倍，多數礦山可以露天開採，並有廉價的勞動力，這些優越的競爭條件，使它成為美國在世界銅市場上主要的競爭對手。一九三七年，它的銅產量就達到資本主義世界總產量的百分之十八左右。自一九五六年資本主義世界銅的生產過剩危機開始以後，到一九五九年，美國控制的銅產量在資本主義世界總產量中的比重，已從百分之六十三下降到百分之五十六，而加丹加——北羅得西亞銅礦的產量所占的比重，則從百分之二十一點四上升為百分之二十六點五。這種情況當然是美國壟斷資本所不能容忍的。

加丹加的得失，不但關係到老殖民主義者在剛果的經濟利益能否保持，而且由於這個地區位於剛果的南端，是進入中非、東非和南非的門戶，在非洲據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從來都是殖民主義者用來控制剛果並進而控制非洲的據點。長期以來，英國一直想把加丹加同它在中非、東非和南非的殖民地、附屬國用某種“聯盟”的形式連結起來，以巩固它在非洲殖民統治的“最後基地”。而美國新殖民主義者，也同樣在千方百計地企圖把加丹加從老殖民主義者手中奪取過來，作為自



已插足中非、东非和南非的跳板。

一个蛮横地要全部鲸吞，一个顽强地想重点据守，彼此针锋相对，各不退让，这就使新老殖民主义者在刚果的矛盾和斗争更加尖锐起来。

三

列宁在分析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时指出：“他们掠夺世界，互相争斗，互相厮杀。想长期掩盖这一点是不可能的。”^①列宁还说：“私有制就是掠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国家就是强盗的国家，而强盗为了分赃就不免要互相厮杀。”^②尽管它们有时采取“和平”的斗争形式，但是，当这种形式不能达到它们的目的时，它们就要用武力来解决。近几年来，以美国新殖民主义者为一方，以英、比等老殖民主义者为另一方，为了争夺刚果所进行的三次火并，又一次证实了这个正确的论断。

一九六〇年七月，当美国帝国主义正在积极准备拼凑“联合国军”出兵刚果时，英、比等老殖民主义者为了把加丹加从刚果分裂出来，也指使其傀儡冲伯集团，匆忙宣布加丹加“独立”，企图以此造成分裂和继续霸占加丹加的“合法”局面。但是，打着联合国招牌的美国帝国主义不但照样把“联合国军”开进加丹加，而且操纵安理会通过决议，要求“不在联合国指挥下的所有比利时和其他外国军事和准军事人员、政治顾问和雇佣军等立即撤离刚果”。这个决议还赋予“联合国军”“在

必要时使用武力”的权力。比利时殖民者在美国的压力下，被迫将军队撤出加丹加，但是却把包括飞机在内的大批军用物资交给冲伯集团，帮助冲伯集团扩充军队，建立封建部落武装，并在西欧各国和中非联邦、南非等地招募雇佣军、扩充实力，准备顽抗。

一九六一年八月，美帝国主义一面指使它的代理人组成所谓“中央政府”，将支配刚果的政治大权抓到手里；一面加紧向加丹加增运“联合国军”，积极进行夺取加丹加的军事部署。九月中旬，在美帝国主义驱使下的“联合国军”向加丹加发动武装进攻，从而爆发了新老殖民主义者在刚果的第一次火并。这次火并，由于老殖民主义者支持的冲伯集团坚决抵抗，“联合国军”没有能够达到预期目的，不得不暂时停火，但是经过重整实力之后，很快就在同年十二月又再次发动了第二次火并。

对于帝国主义的这种“暴力行动”，老殖民主义者表示了极大的“愤怒”。英国资产阶级报刊连续发表社论，猛烈攻击“联合国在这个不幸的国土上奉行的是一种完全不符合英国政府的利益和愿望的政策”，“他们的目的既简单又丢脸：搞垮冲伯政府，控制加丹加的钱，以使得这些钱可以像刚果其余的资源一样被挥霍掉”。比利时的报刊对美国新殖民主义者利用联合国吞并加丹加的“侵略”

① 《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4页。

② 《在莫斯科省的县、乡、村执行委员会主席会议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91页。



行动也一再表示不满。

第二次火并虽然使新殖民主义者取得了某些优势，但还是没有能使冲伯集团屈服。于是，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美国驻利奥波德维尔大使公开出面，安排利奥波德维尔政权同加丹加冲伯集团双方进行谈判。与此同时，新老殖民主义者也不断在幕后进行活动。但是，由于他们之间的利害冲突无法调和，经过将近一年的讨价还价，始终未能达成任何实质性的协议。

一九六二年底，美帝国主义为了反击英国策动中、东非国家排挤和代替联合国干预刚果的企图，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再一次驱使“联合国军”对冲伯集团发动进攻。这次火并终于迫使冲伯集团宣布结束加丹加的分裂状态，承认阿杜拉政府对加丹加的管辖权，从而实现了美国统治集团所谓的“统一”。

经过三年来的明争暗斗，美国帝国主义在刚果的地位正在加强，老殖民主义者的势力受到了排挤和削弱。现在美国帝国主义不仅通过它一手扶植的阿杜拉傀儡政权，控制了刚果的财政和对外贸易，而且还通过经济“援助”，使刚果对它的依附愈来愈深。从刚果宣布独立到一九六三年六月底，美国以“联合国刚果基金”、“特别信用基金”等名义，拨给刚果政府的经济“援助”共达一亿二千三百多万美元，为美国在刚果倾销“剩余”商品开辟了道路。一九六二年美国对刚果的出口额已猛增至六千八百万美元，为一九六一年的三倍，成为刚果市场的首要供应者。一九六二年十一月美国政府与阿杜拉政府签订的

对美国私人和公司到刚果投资的保证协定，更为美国资本大量渗入刚果打开了大门。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美国已经逐渐取代老殖民主义者在刚果的地位，成为刚果人民当前最凶恶的敌人。

四

刚果在名义上的“统一”，并不意味着帝国主义在刚果的矛盾和斗争已经得到解决。在刚果的经济实力远比美国雄厚的老殖民主义者，是不会甘心他们的失败的，他们正在根据各自的利益，从各个不同的方面，采取各种不同的手法，与美国新殖民主义者对抗，竭力保持甚至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事情正像美国垄断资本的喉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所招认的那样：“尽管联合国军在那个麻烦的国家取得了军事胜利，较多的是美国，而不是其他任何国家，将发现它在刚果的麻烦只是刚刚开始。”

刚果“统一”以后，英、比等老殖民主义者不仅仍然保持着各自在刚果的经济利益，控制着刚果的主要企业，而且还在继续增加新的投资和加紧拉拢阿杜拉政府。不久前，比利时政府通过同阿杜拉政府缔结技术合作协定，答应给予刚果以“充分的技术援助”，企图卷土重来，扩大它在这个傀儡政权中的影响。据美国报刊透露，现在已经派到刚果帮助阿杜拉政府改组财政、工矿企业和进出口贸易的比利时顾问和专家，以及各种行政、文教和技术人员，已达二千人左



右。此外，比利时政府还利用美国改編剛果军队的計劃，积极与美国爭夺对剛果政府軍的控制权。据英国报纸透露，英国政府在今年七月邀請阿杜拉訪英后，也表示要向剛果提供“經濟援助”和幫助阿杜拉政府訓練軍隊。最近，英国政府已經接受阿杜拉政府的要求，同意給予約二百万美元的“援助”。与此同时，正在非洲积极巩固和擴張自己势力范围的法国戴高乐政府，为了把剛果拉入“非洲——馬尔加什联盟”，也向阿杜拉政府提出了包括許諾給予每年两亿美元在內的一系列“援助”項目。四月間，法国派往剛果的一个代表团并且声称，法国对剛果的“援助”将采取直接提供的形式，“不通过联合国”。

在英、比等老殖民主义者支持下的冲伯政权，虽然被迫解散，但是冲伯一再表示他絕不承认任何人有权剥夺加丹加的“自决权”。他說，“关于剛果問題用武力强迫实行的任何解决办法，都不能是肯定的解决办法”。今年六月，冲伯又揚言他絕不放棄他的职责，而且准备“接管”中央政权。事实上，冲伯集团至今仍然控制着加丹加西部的路阿拉巴省，并在东加丹加省保持着强大的影响；他所掌握的武装力量也基本上还保存在自己手里，并且利用一切机会进行活动。据法国《国际論壇》周刊今年九月自伊利沙伯維尔发出的一条消息說，“加丹加的秩序远沒有恢复。除了联合国部队勉强地保证了最低限度的安全的主要城市之外，前加丹加政府的部队实行了恐怖統治。冲伯的宪

兵躲在丛林中繼續进行破坏活动，悍然反抗利奥波德維尔当局派去追赶他們的部队。看来这些宪兵并不打算交出武器和接受中央政府的法律。……叛乱分子期待着冲伯将在伊利沙伯維尔重掌权力的一天，他們认为这一天临近了。”

新老殖民主义在剛果的爭夺給剛果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前門狼未走，后門虎又来。多少年来，剛果人民在新老殖民主义者的残酷統治下，被剝夺了一切权利，过着极端痛苦的生活。但是，他們也从自己的苦难中，从生与死的斗争中，得到了锻炼。广闊的国土被踐踏，丰富的宝藏被掠夺，勤劳的人民被屠杀，这一切不能不激起剛果广大人民极大的愤怒和反抗。这些年来，剛果人民为了爭取自由和民族独立，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并且一度贏得了政治上的独立。虽然由于狡猾的新老殖民主义者的扼杀，他們的解放事业在中途遭到了严重的挫折，但是，这只是暫时的，剛果人民将更清楚地看出新老殖民主义者虛伪、貪婪和殘暴的反动本性，認識到摆脱奴役和苦难的道路只能是团结起来，坚决同新老殖民主义者——首先是美国新殖民主义者及其走狗进行不屈不撓的斗争，一个也不留地把这些嗜血的强盜从剛果的土地上彻底清除出去。

已經点燃的剛果人民爭取独立、反抗侵略和压迫的革命火种，是永远不会熄灭的。尽管剛果人民革命斗争的道路将是曲折的，但是，在全世界人民的支持下，他們爭取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一定能够获得最后胜利！



現代資產階級的新實在論哲學

任 华

新實在論是現代資產階級哲學的重要流派之一。它产生于二十世紀初期。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它流行于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英美兩國。英國新實在論的主要代表是穆爾、亞歷山大等。美國新實在論的代表是培里、霍特、孟太格等。一九二四年以後遷居美國的英國哲學家懷特海，也是這派哲學的一個重要代表人物。

新實在論實質上是一種主觀唯心主義和客觀唯心主義的折衷雜拌哲學。這種哲學是同馬赫主義、實用主義等現代實證主義流派一脈相通的，並且在其發展過程中日益和這些流派融合起來，以至現在它們之間的分別可以說已微不足道了。

新實在論者不敢公開承認他們的哲學是唯心主義，却把它叫做“實在論”，企圖以“認識的對象是客觀獨立的實在”這一說法，來掩蓋他們這種哲學的唯心主義實質。中世紀的經院哲學家曾經把柏拉圖的客觀唯心主義稱為“實在論”，新實在論者襲用了這種作法，不過在他們的“實在論”的前面加上一個“新”字罷了。

新實在論特別流行于英美兩國，不是偶然的。大家知道，英美兩國的資產階級早已成了反動的階級，但是仍然披着“民主”的外衣，把它作為欺騙人民，維護反動統治的

工具，並且用它來反對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英美兩國的資產階級把它們的國家說成是“民主自由”的堡壘，而它們的思想代表便成為表達這種願望的喉舌。新實在論者正是這樣的一種突出的思想代表。例如，美國的新實在論者培里就是所謂美國“民主”的大力宣傳者。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就公開反對馬克思主義，頌揚美國“民主”。他說：“極端革命的宣傳在這個國家（指美國——引者）取得這樣小的進展，工人作為一個階級一向並沒有感到需要形成一個明確的政黨，這個事實是由于下面這樣一件事實造成的：即工人階級的確在現存制度中找到了他們的真正機會”^①。這就是說，馬克思主義在美國行不通，美國的工人階級不需要馬克思主義政黨，因為在美國的“民主自由”社會里，工人和資本家一樣有機會發財致富，得到幸福的生活。培里竭力美化美國壟斷資產階級的政權，否認美國需要革命，他說：“我們現有的政體已經經受了國內外戰爭和巨大社會變革的考驗”，因此，“我雖然預見到重大的變化，但我卻預見不到革命”^②。新實在論者把自己的哲學說成是適合并服務於這種民主主義的哲

①② 《現代理想的衝突》，美國紐約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18年版，第502、539頁。



学。因此，新实在論在自命为“民主堡垒”的英美两国找到了它的最适宜的滋长园地，是不足为奇的。

这里，我們准备首先考察新实在論者歪曲利用現代科学成就，他們制定的所謂“哲学中的科学方法”；然后以培里等的著作作为代表，揭露新实在論者如何利用这种方法，宣揚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最后，指出这种哲学的危害性。

以保卫“民主”自詡的英美資產階級，企图把科学这面旗帜攬到自己的手中，自封为科学的信奉者。它們的代言人新实在論者不但大讲“民主”，而且侈談“科学”，声称他們的“民主”是完全符合于科学精神的。

同馬赫主义者着重歪曲利用物理科学有所不同，新实在論者特別着重歪曲利用的是現代数学及随之发展起来的数理邏輯的成就。他們企图赋予数学和数理邏輯以一种先驗的、純粹概念的分析 and 演繹的性质，并且企图把这种分析和演繹方法，直接推广应用于哲学，从而提出他們的所謂“邏輯分析方法”。他們认为，只有使用这种方法，才能够把哲学納入科学研究的正軌，所以，哲学的本质就是邏輯。美国的一些新实在論者說：“作为傳統研究方法的典范的邏輯与数学本身已經經過了一种彻底的修正，已經为准确思維的一般原理提供了新的綫索”^①。因此，“哲学必須和邏輯結合起来，……并且把最精确的科学形式的准則用到自己的建設程序上来”^②。所謂“最精确的科学形式的准則”，就是指邏

輯推論和邏輯分析原則。新实在論者用这种原則和方法来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

新实在論者的这种方法論具有明显的形而上学性质。在这种方法指导下，他們把哲学变成了脱离实际的概念分析。照他們看来，哲学的任务，在于把常識和科学中的某些基本概念和命題，加以邏輯的、概念的分析；分析的结果并不能使人們得到真理，只能帮助人們把已有的某些概念弄得更清楚一些，使人們解除理智上的困惑。因此，哲学家应当采取一种为知識而知識的态度，把知識看成純粹可以“冥想的”。这就是新实在論者应用“邏輯分析法”所得到的“科学的哲学”。它不能够帮助人們認識客观規律。試問：这样的哲学究竟有什么科学的气息？沒有，一点也沒有。它是完全同科学背道而馳的。

新实在論者的“邏輯分析方法”，其极端的表現，竟至要求把哲学变成他們所理解的那种所謂先驗的数学或数理邏輯的演繹系統。美国新实在論者霍特在他的《意識的概念》一书中宣称，現代邏輯是从少数未經定义的概念开始，把整个邏輯系統推演出来。他进而认为客观世界也应当是这样的系統。他把邏輯的基本概念和命題，說成是什么“中立的东西”，企图由此推导出所謂“复合物”。这种“复合物”，首先是性质，其次是空間、時間、运动、质量，再其次是物体，有机体，最后是意識。这样，在霍特看来，整个世界万物，完全变成了一个邏輯的构造系統，也就是邏輯的演繹系統了。霍特等人认为，这就是

①② 霍特、培里等著：《新实在論》，美国紐約 The Macmillan Co. 1912 年版，第 21、26 頁。



邏輯分析的最終目的，也是哲學真正科學化的最高表現。其實，這是很荒謬的。不用說，他們把數學和邏輯看成是純粹抽象概念的先驗演繹系統，已經是錯誤的唯心主義觀點；即使數學和邏輯具有明確的演繹性質，這也只是由於它們的對象的特殊性質所決定的。而演繹方法，是人們根據對客觀事物某種規律性的認識而得來的。它在一定條件下是有作用的，抹殺或低估這種作用當然是不對的，但是，我們絕不能把它的作用加以片面地夸大。新實在論者硬要把在數學和數理邏輯中起明顯作用的演繹方法，說成是唯一的科學方法，強使哲學數學邏輯化，其結果只能夠使他們走上荒謬的道路，使這種哲學成為唯心主義的虛構。

二

英美的新實在論者，以反對十九世紀末的新黑格爾主義自居，並聲稱要對貝克萊的唯心主義哲學進行批判。新實在論者的這種作法給人一種印象，好像他們真是在反對唯心主義，堅持唯物主義。其實不然。只要對他們的主張做一番考察，就可以看出他們的這種作法完全是一套騙人的詭計。

美國的一些新實在論者煞有介事地宣布：他們要把貝克萊的原理作為唯心主義的基本原理來加以批判。他們說，貝克萊的觀點的錯誤，是由於他利用了一種所謂“自我中心的困境”所引起的。什麼叫作“自我中心的困境”呢？照美國的新實在論者看來，一個人是不能離開他和事物的認識關係來認識事物的；因為當他意識到對象時，他的意

識總是和對象在一起的。這會產生什麼困難呢？照培里的說法，困難就在於，如果我既已處在一種認識的關係之中，“為了要想發現（如果可能的話）一個事物恰恰是怎樣為這種認識關係所改變的，我就要發現一些關於在這種關係以外的事物的例子，以便於我可以把它們和在這種關係以內的事物的例子加以比較。但是我不能發現這樣的事例，因為‘發現’也是我試欲避免的這種關係的一種。”^① 孟太格也說，“我們可以把一隻狗放到一隻貓的面前而觀察到它叫，然後把它帶走，同時也看到它不叫了。於是我們滿可以得出結論說，狗的叫是依賴於它處在貓的面前的……但是我們不能在我們看見一事物之前或以後來看一看這個事物以便發現我們看見它是否改變了它的樣子”^②。

美國的一些新實在論者認為，貝克萊的錯誤在於利用了這種“困境”來論證他的唯心主義。培里說，“貝克萊最後一著就是訴之于這個論點”：“一個人不能想到事物離開意識而存在，因為一想到它，事實上就把它置於意識之內了”^③。美國的新實在論者表示反對貝克萊的這種作法。照他們看來，雖然由於存在着“自我中心的困境”，我們不能把認識關係以內和以外的東西加以比較，從而直接證明事物可以離開人的認識而獨立存在。他們並且表示，由於存在着這種“困境”，要求我們這樣來直接證明這點本身就是不合理的。特別是他們提出來，意識和我們所意

①③ 《現代哲學傾向》，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第127—128、127頁。

② Runes 編：《二十世紀哲學》，美國 Littlefield, Adams and Co. 1956年版，第373頁。



三

識到的对象同在一起并不能决定对象是否依赖于意識而存在。培里說：“自我中心的困境”“絲毫也沒有证明什么。它只是一个在方法論上的特殊困难”，它只“包括有这样一个命題：每一論及的事物就是一个观念。但实际上这是一个重复的命題，意思是說，每一被論及的事物是被論及的”^①。因此，它不能給“唯心主义的目的服务”。

美国新实在論者对貝克萊的这种批評，我們只要加以分析，就可以看出他們的观点同貝克萊的观点在本质上沒有有什么不同。他們既然承认人在与事物的認識关系中不可能证明事物是独立于人的認識而存在的，这就表明他們並沒有真正从主观唯心主义的泥潭中自拔出来。照唯物主义者看来，人是能和事物发生認識的关系中证明事物是独立于人的意識而存在的。这种情境是理所当然的，根本不存在新实在論者所說的“自我中心的困境”。

美国新实在論者的这种錯誤，并不是偶然的。这是由于他們本来就是要在“实在論”的名义下宣揚主观唯心主义，因此他們对于貝克萊的批評也无非是一种作伪的手法而已。培里自己就泄露了这个秘密。他說，貝克萊的論点，“使人們注意到一个毫无疑問存在的情境而且那是哲学最重要的原始发现之一。沒有一位思想家能以……提到一个不是观念的东西，其明显而簡單的理由就是：当一提及它时，他就把它变成一个观念了”^②。培里既然承认只要人一提到事物就把它变成了观念，并且认为是哲学上“最重要的原始发现之一”，这岂不是对貝克萊的唯心主义观点的支持嗎？

美国的一些新实在論者宣称，要用科学方法把認識論和世界观分开。孟太格說：“哲学家应当遵循科学家把他們的問題孤立起来而一个一个地来解决它們的榜样”，“把認識論問題孤立起来，研究在任何知者或認識者与任何他們所知道或認識到的对象之間所得到的認識关系，而不对認識主体或所認識的对象究极性质有所偏見，甚至不提出这方面的問題”^③。孟太格明确宣布，他和他的同道們只是在認識論的問題上同意和采取“实在論”的观点，至于在对思維和存在的关系問題上，他們是持有不同的看法的。在这里，美国新实在論者又玩弄另一欺騙手法。

自然科学家为了研究某种自然現象，常常把一些有关的条件暂时撇开，把这种現象暂时孤立起来加以研究。美国的新实在論者故意曲解科学上所采用的这种研究問題的方法，企图以此割裂認識論和世界观的联系，以便把他們的認識論冒充为类乎唯物論的观点。但是，他們的这种詭計，是不难識破的。

大家知道，世界观和認識論两者是不容割裂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認識論。如果在世界观上不能够采取唯物主义的观点，不承认物质第一性的原理，那么，即使把客观事物說成是某种独立于認識活动而存在的東西，也并不能够改变这种看法的

①② 《現代哲学傾向》，第128、127頁。

③ 見《二十世紀哲学》，第372頁。



唯心主义实质。实际上，美国新实在論者的認識論，正是建立在一种唯心主义世界观之上的。因此，要揭露这种認識論的唯心主义实质，必須首先考察一下他們的世界观。

在世界观上，不少美国的新实在論者以反对二元論为名来反对唯物主义。他們企图掩盖自己哲学的階級实质，采取所謂“中間路綫”。他們继承和发展了馬赫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观点，并且提出所謂“中立一元論”的思想。根据这种思想，他們以反对把心灵和物质看成两种独立的东西为借口，要求根本取消物质的概念，代之以所謂“关系”的概念；主張物质和心灵的分別只是关系上的分別，物质和心灵一样，都不是最根本的存在，而是某种更根本的非心非物，亦心亦物的所謂“中性物”以不同的关系所构成的。培里說：“……心灵和身体两者都是可以分析成为較为原始項目的复杂体……”^①，“当它們一被分析时，看起来，它們所由組成的这些比較原始的項目，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之下，是可以互相变換的”^②。他还說，“这个观点在馬赫《感觉之分析》这本小书中最好地被提出了，……按照这位作者的意見，物理的和心理的要素乃是一样的。”^③这个“要素”是什么呢？馬赫說是“感觉”，詹姆士說是“純粹經驗”，新实在論者說是“中性物”或“原始項目”。这个“中性物”或“原始項目”，实际上仍然是“感觉”和“純粹經驗”一类的东西。因此，新实在論的这种哲学观点，同馬赫主义、实用主义一样，是不折不扣的主观唯心主义。

美国新实在論者正是在这种“中立一元論”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基础上，来建立他們的認識論的，这样的認識論当然也只能是唯心主义的。

培里从所謂“中立一元論”出发，在認識論上也以反对二元論为名来建立他的所謂“內在的东西的独立性”的原理。实际上，这是同唯物主义的反映論直接对立的一种主观唯心主义認識論。培里說：“內在說肯定知識与事物之間的区别，正如心灵与身体之間的区别一样，乃是一种关系上的和机能上的区别而不是一种內容上的区别，这样便糾正了二元論”，而“在对物体对象的知觉中便不再包括有什么特殊的困难了”。因为同一的东西，“在借助于一种关系而成为物体的东西的同时，它也可以借助于另一种关系而成为知觉的內容”。所以，“当我感知火星时，这个太阳卫星(物体)便是我的知觉(心灵)；这和我們假定我叔叔是我父亲的兄弟一样，是没有什么矛盾的。”^④这就是說，如果承认物质和心灵都是彼此独立的实体，这在認識論上必然把客观事物变成不可捉摸的东西，因而会导致不可知論。培里认为，要避免不可知論，只有采取“中立一元論”观点，把物质和心灵都变成同一种元素以不同的关系构成的东西。同一的元素，在一种关系中取得物质的性质，并不排斥它可以同时在另一种关系中取得精神的性质。像同一个人对于我父亲來說是兄弟，而对于我來說是叔叔一样，关系

①②③④ 《現代哲学傾向》，第302、303、303、304頁。



虽有不同，人总是同一个人。培里认为，所谓认识关系，也不过就是这种心物关系的一种表现。因此，当我们认识一事物的时候，不能说，这事物是一种存在，我们对于它的观念是另一种存在，只能承认它们就是同一的东西，不过处于不同的关系罢了。既然如此，也就可以说，事物既是内在于我们的心灵的，同时也是独立于我们的心灵的。这就是培里所谓“内在的东西的独立性”的原理。培里并且毫不掩饰地宣称：“现代的实在论比较地接近于休谟所建议的‘观念’的一元论的实在论”^①。

培里的这种所谓“内在的东西的独立性”的观点，也就是孟太格所说的“直接呈现的实在论”。孟太格宣布“至少我们意识到的有些特殊东西在我们没有意识到它们时也照样存在”之后，接着就说，这些东西是“直接认识到的而不是间接通过摹写或心像认识的”，孟太格并且说：“这是与笛卡儿和洛克的代表的实在论或认识论的二元论相对立的一种直接呈现的实在论”^②。孟太格所谓“直接呈现的实在论”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观点呢？美国的一些新实在论者自己说得很清楚，他们说：这种观点是同“实在论”观点密切联系着的。他们说：“当知识发生时，在心灵中或其面前的知识内容是 and 所知的事物在数目上同一的。”“当事物被意识到的时候，它们本身就变成了意识的内容”^③。可见孟太格所谓“直接呈现的实在论”，正是培里的“内在性”与“独立性”的二位一体说。

从上面的这些简单分析中，可以看出，美

国新实在论者口口声声要反对笛卡儿和洛克等人的二元论，实际上是要利用这些哲学家的机械唯物主义的缺点来反对他们的认识论中的合理因素，反对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他们企图建立的所谓“直接呈现的实在论”，归根到底，就是要肯定客观事物和作为其反映、摹写的主观形象——观念是完全同一的，并且把这种主张同休谟的观点联系起来，这难道不是十足的主观唯心主义吗？他们企图用所谓“中立一元论”来掩饰他们的主观唯心主义，显然是徒劳的。美国的新实在论者是在“中立一元论”掩盖下的唯心主义世界观中先把事物变成了观念，使它取得了观念的身份，然后才在这个基础上把他们的认识论建立起来。他们企图用这种手法来调和所谓“内在性”与“独立性”的矛盾，是绝对办不到的。新实在论者说来说去，无非是要把客观事物和观念完全等同起来，把客观事物说成是一种观念。

四

从上述可以看出，新实在论的观点，实际上是贝克莱和休谟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翻版。不过新实在论还有一点不同于这些主观唯心主义流派的表现，那就是它还杂有明显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倾向。这一点，是同新实在论者侧重歪曲利用数学和数理逻辑有密切

^① 《现代哲学倾向》，第300页。

^② 《二十世纪哲学》，第372—373页。

^③ 《新实在论》，第35页。



联系的。

新实在论者根据“逻辑分析方法”，要求把它推广到感觉性质以外的范围。培里说：“物理的和心理的复杂体不仅在可感觉的性质上，而且在一定的更为根本的形式关系上，……都有其共同之点。这些关系在它们的纯粹状态中只有用超越于可感觉的区别作用范围以外的分析才能够被发现。”^①于是他宣称：“科学并不是一切的真理，而物理的自然也不是一切的存在”，“物理科学预先承认了逻辑和数学；或者说，物理的实在是复杂的，可以分解为较为简单的事项和关系的”^②。换言之，“逻辑先于物理学，这意思是说，它需要涉及实在的较为基本的形式”^③。培里所说的“较为简单的事项和关系”、“实在的较为基本的形式”等，都是指逻辑和数学的基本概念和命题一类的东西。新实在论者不但把这些东西看成是最根本的，而且把它们说成是所谓客观独立存在的，或如他们所常说的“潜在的”共相的主要范例。这就是一种柏拉图式的客观唯心主义的表现。孟太格说：新实在论的一个基本论点，就是肯定“至少我们所意识到的有些本质或共相在我们没有意识到它们的时候是潜在的”，并且明确宣称，“这是柏拉图的或潜在的实在论”^④。在另一地方，美国的一些新实在论者说：“新实在论者也是一个柏拉图的实在论者。他赋予思维的东西和感觉的东西，赋予逻辑的东西和物理的东西，赋予潜在的东西和存在的东西以充分的本体论上的地位”^⑤。照新实在论者看来，一般的共相是和特殊的东西完全对立的，二者的存在

具有根本不同的意义。特殊的事物是存在于时间之内的，但是“共相”并不是在这种意义上存在着。“共相”是永存的，是超时间的。

新实在论者把一般和个别割裂为永恒不变的“共相世界”和“特殊事物的世界”之后，就在这个基础上也把知识割裂为经验的和先验的两种。他们的所谓先验的知识，是不能被经验所证明的，它只处理“共相”之间的关系。这种知识，照他们看来，主要就是逻辑和纯粹数学的知识。新实在论者的这种观点，把反映事物的普遍概念变成客观独立存在的东西，并把它们同客观存在的个别事物割裂开来，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又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割裂开来，根本否认了二者的联系，否定了理性认识必须来源于感性认识的唯物主义原理。这种观点的客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性质是十分明显的。

新实在论者为什么要作这样的割裂呢？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企图否定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和经验知识的确实性。从主观唯心主义出发，他们认为，事物之间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因此，一切经验的知识都是或然的，没有必然的确实性，而数学和逻辑的知识却是必然的。新实在论者认为，数学和逻辑知识的必然性不是由经验得来的，因此就只能是先验的了。既然这类知识是先验的，因此它的对象就不可能求之于现实的世界，而必须求之于另一世界了，即所谓“共相世界”，

①②③ 《现代哲学倾向》，第303、109、110页。

④ 《二十世纪哲学》，第373页。

⑤ 《新实在论》，第35页。



这就是他們的邏輯。这种邏輯是很荒謬的，它抹杀了事物发展的規律性，否定了經驗知識的客观必然性，也否定了数学和邏輯在客观物质世界的基础。

* * *

总起来看，新实在論是现代实证主义的一个流派。它歪曲利用现代数学和数理邏輯，提出所謂研究哲学的“邏輯分析方法”，宣揚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这种哲学是十分有害的。

首先，新实在論否认客观世界及其規律性，否认客观世界及其規律性是可以認識的，把客观事物的必然性归之于所謂“共相世界”。这就一方面从根本上否定了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学說的基础；而另一方面，把人民群众的注意力从现实世界轉移到所謂“可能的世界”，麻痹人民的革命意志，使他們不起来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以利于帝国主义的統治。

其次，新实在論者还用这种哲学来为资产阶级的民主作論证。培里說，“实在論的倫理学是个人主义的、民主主义的和人道主义的”^①。因为它是一种多元論，而“多元論者要說在个人中有着一种內在的和最后的价值”^②。

新实在論者还根据他們所标榜的“中立一元論”来反对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論。他們宣称，事实上根本没有馬克思所假定的这样一种在资本家和无产者之間的明确的划分，因为，在现代世界里，已經出現了一个新的“中等阶级”，这个新的“中

等阶级”已經把以前由资本家所行使的一切或大部分职能接受过来了，因此，这个阶级似乎起着越来越大的左右社会和調和阶级矛盾的作用。他們的这种反对阶级斗争的“理論”，是他們的“中立一元論”的根据，同时他們的“中立一元論”，又轉过来促进这种“理論”的傳播，对广大人民起着麻痹的作用。

最后，新实在論者所宣揚的“邏輯分析方法”，还在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煽起一股煩瑣的歪風，专务不着实际的文字概念游戏，为稍后的邏輯实证主义和所謂英国分析哲学等等作了准备。新实在論本身也进而同这些流派融成一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开始汇为一股更加与馬克思主义为敌的实证主义潮流。

新实在論对“五四”以后的中国资产阶级哲学，也发生过相当大的影响。它所标榜的“实在論”曾經迷惑过一部分人。特别是它所宣揚的邏輯分析哲学，曾經使当时一部分自命清高而不过問政治的哲学工作者，沉溺于玩物丧志的学院式的煩瑣哲学研究，对馬克思主义哲学采取了漠不关心的、拒絕的乃至对抗的态度。在这种新实在論的影响之下，所謂沒有事实的必然，只有邏輯的必然，成了当时一部分哲学工作者的信条，其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所以，無論从新实在論在今天已經成为资产阶级实证主义的一个組成部分来看，或者从它对中国的资产阶级哲学所曾經发生过的影响来看，对这种哲学流派进行批判，都是十分必要的。

①② 《现代理想的冲突》，第279、375頁。

